

卷首语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界标,《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它的成长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学发展的春天同步。

追踪中国史研究的动向和发展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近40年的历程中,我们的编辑队伍历经了历史所的几代学人,其栏目设置也几经变化和调整,但始终在坚持这项使命。迄今2000多万言的文字间,不仅蕴含着中国史学界长时段的研究信息及变迁,而且反映了历史学科系统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在不同时段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突显出史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

共建学术平台,深化学术研究是本刊秉承的又一项重要使命。与各位作者和读者一样,《中国史研究动态》也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参与者,见证了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轨迹。其间学术视角的转化,研究视野的拓展,不同观点的争鸣,史学理论的进展,在反映中国史研究进程的同时,也倾注了编者的编辑理念和学术追求,体现着这部杂志与时代和史学的联系。

引领学术风向,激动学术潮流是专业史学期刊应当承担的使命。我们认为“动态”是曲折,是波动,是变化,是潮流,是热点,是创新,是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需要呈现对既往中国史学发展的批判和总结,同时,也应当指明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历史学的变革影响深远,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策划推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分为六个时期,回顾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特定进程,展示整个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水平,以此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省思。

“不畏浮云遮望眼”,40年的中国史研究历程曲折而辉煌,40年的《中国史研究动态》载录了这份曲折与辉煌,它是见证者,是鼓舞者,是引领者,我们将一如既往,践行自身的使命,与史学界共勉。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

——写给 《中国史研究动态》 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卜宪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无论从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看,这 40 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以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先秦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辽宋夏金史研究、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为专题,策划推出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回顾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展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前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里,我仅就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究天人之际”是探究事物的本质,“通古今之变”是探讨事物的规律。历史研究对事物本质与规律探究的这种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在一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决定了史学与所有学问一样,是作为一门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学问而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所服务的主体内涵有所不同而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由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但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认为,事实判断是寻找个别事物的真实历史状态及其内在联系,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实际上,我们在承认事实判断具有客观性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事实研究的选择性。史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其关注、研究、分析的对象,是与其历史观、价值观,与其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因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际上也很难绝对分离。所以我们说,

无论是探讨本质、规律，还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历史研究本质上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古往今来有很多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也有很多阐释史学自身理论与方法的史学理论。就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最为科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首先，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同个体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但又要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唯物史观把历史与自然史相区别，把人的历史与神“创造”的历史相剥离，把客观历史与唯心主义哲学家头脑中“想象的活动”的“历史”相分离，而不再被视为检验他们“逻辑结构的工具”，从而将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肯定了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因此，尊重客观历史，尊重人类伟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是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最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其次，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客观性。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无法割断的客观过程，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产力”。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基础，人们的物质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过程及其变化，而生产力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逐渐由低级向高级的阶段式规律演进。政治关系、法律形态、思想观念意识的变化，无不从属于这一经济关系的演变。最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指明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历史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偶然与必然、特殊与一般、现象与本质、整体与局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在矛盾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唯物史观，能够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的传入并被中国史学家所接受，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进步，而与中国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则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成就。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马克思史学相比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要成就的取得，都与人们在唯物史观认识上的进步有关，众多的史学大师，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等，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环境不可分离。不可否认，20 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经历了曲折和困顿，这些挫折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不能教条地对待唯物史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继承原先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摒弃其僵化、教条化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二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8 到 1989 年,是在反思与争鸣中对唯物史观的探索。1978 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开始。在打破“两个凡是”枷锁、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史学界返本清源,由对“左”倾思想干扰的思考,进而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化与绝对化的错误,以及过度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史学内在发展路径探讨所造成的失误,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由此引发了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阶段,史论关系的热烈讨论,引出了“生产力动力说”“生产关系动力说”“合力动力说”“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动力说”等多种解读。史学界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问题中,逐步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力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整体进步。

第二个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末,是在史学研究多元格局中的唯物史观探索。受苏东剧变、西方史学理论思潮和方法的输入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史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一方面,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理论研究“冷场”,未能出现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史学理论热点问题的大讨论,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潜流,史学研究也表现出“碎片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体系受到考验。另一方面,对于唯物史观自身理论内涵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形成世纪末的史学反思与对新世纪史学的展望。《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了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996 年第 2 期)、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第 4 期)、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1997 年第 4 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1998 年第 6 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对 20 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路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是 20 世纪末压轴性的中国通史作品,全书共 12 卷,42 册,约 1200 万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学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在多个方面推进了中国通史的撰述,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个阶段为 21 世纪以来,是在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的唯物史观探索。2004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多次强调要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 年 4 月,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推动力”。其中“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新的实

际并加以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瞿林东《理论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唯物史观如何解决好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与优秀传统史学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思潮及流派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撰文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探讨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陈其泰《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探讨如何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继续运用于中国古代史领域,但应更彰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看法都深化了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历史结合的认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深挖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明了方向。

三

40年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科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纵深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从本期六位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代史各断代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看到这些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侧重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优势,但过多拘泥于具体问题研究,忽略了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问题研究,导致在诸如社会形态等问题上的误解或曲解。第二,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普遍,长时段、多维度的历史著作缺乏,个案研究占大多数,缺乏对历史发展的动态把握与规律性总结著作。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方法大量涌入,许多理论、话语乃至问题意识引进自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表述和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

1. 某些人对新中国建立后17年史学全盘否定。17年史学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

题,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淡漠。将17年史学归纳为农民战争史,称为“完全政治化”的时代等说法尽管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古代史学界也受到质疑,但是这种说法的影响依然存在。某些学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超越”“淡化”“回归文本”的种种说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政治化”等指责,都削弱了中国古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

2. 缺乏对中国古代史宏观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与把握,明显呈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的状况。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各断代还是通史中,都积累了大量需要研究和关注的宏观性、结构性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够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及各断代史有相应的把握,从而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目前相关领域中的一些学者不仅对牵涉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宏观问题不再关注,即便对其所研究的某个断代史的总体性把握也非常不够。

3.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脱离、远离现实的状况。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现象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顾历史真实,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说,试图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评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言论》,《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全盘否定。归根结底,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完全虚无,他们本质上虚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其他。历史虚无主义对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来说影响虽然并不普遍,但如果我们不加注意,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股思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传播还会扩大。

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尽管当今有纷繁复杂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潮的存在,但从根本上解释客观历史的发展,其科学性和完整性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取代唯物史观。如同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的中国史学“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我在《3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中写道“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如今,中国古代史学者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的“科学的春天”而成长,凝聚着历史所几代学人和编者的心血,寄托着中国古代史学人的殷切希望。在此,也祝愿她的前景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苏 辉)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先秦史研究

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改革开放 40 年来, 先秦史研究不论在史料的发现与运用, 还是在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上, 皆取得了长足进展, 重要成果层出不穷。《逸周书·尝麦》言“夫循乃德, 式监不远”, 即谓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 为当下研究提供鉴戒。本文对相关成果的概述难免有遗珠之憾, 是愚闻见不广的结果, 这是先要深致歉意的。

一、概述与理论研究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 “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 里仁书局, 1979 年, 第 1377 页) 近 40 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发展, 也正遵循这条道路前行。改革开放 40 年来, 大量材料的整理和公布, 带动了相关研究。

首先是传世文献的持续深入梳理。此时期对传世文献的系统综合整理研究, 成果显著, 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顾颉刚与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 2005 年) 等。相关研究如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2017 年增订)、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 2013 年) 等, 皆有深研卓见。此外,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及《续编》亦尤为学界重视。

其次是对既有出土文献的整理和汇编。20 世纪以来, 大量甲骨、青铜器以及简帛出土, 相关著录数以千百计。将之系统整理、汇编,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持, 成为一段时间内史学工作者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以来, 《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及《补编》(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甲骨文合集材料

来源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和《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1984—1994 年, 2007 年修订增补)、《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1 年)、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 2001 年)、马承源主编多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 1986—1990 年)、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 1987 年, 2006 年修订)、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 2006 年), 皆嘉惠学林, 很值得称赞。

长期以来, 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根本性转变。白寿彝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可以说是这一转变的标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学者对传统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和自觉突破。“酋邦”“早期国家”“中心聚落”等理论成果逐渐成为先秦史学者理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的钥匙。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等, 皆是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

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同样跳出了传统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如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以实证研究方式对先秦时期具体社会状况进行了考索。在此基础上, 诸家学者不懈努力, 自下而上地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超越。张广志与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沈长云与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等对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形态问题, 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此外, 对先秦国家形态的研究也是一大亮点。区别于社会形态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国家形态研究主要侧重于关注政权如何组织管理, 国家权力如何运行。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等成果的次第出现, 体现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

社会史研究方面, 社会组织构成与转变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2004 年增订) 从“家族”这一血缘与社会组织层面系统分析先秦时期的社会构成, 可谓此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除了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宏观把握, 对具体社会生活微观考察也卓有成绩。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该书对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了专门梳理, 论证精审, 自成一家。

制度史研究在此时期涌现了大量重要成果。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 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 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某项制度进行系统的专题梳理,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

务印书馆, 2004 年)、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等, 都是值得称许的成果。

思想史随着大量先秦典籍文献的出土, 成为研究热门。进行体系性建构的, 以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为典型代表。此外还有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 年)及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 2004 年)等, 相关成果至为繁富。

先秦史研究在近 40 年中走向繁荣, 对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与综合功不可没。跨学科研究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和常态化手段。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 都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助力。代表性成果有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及其《续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与《再续集》(科学出版社, 2011 年)、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 1987 年)、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以及胡厚宣、于省吾、裘锡圭等在古文字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 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展开, 也为先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

以上所举, 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先秦史研究的荦荦大者, 至于专门研究, 将在下面进行阐述。

二、传说时代与考古学研究

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 主要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文明、国家起源与传说时代两个角度展开。

这一时期, 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索上的主要收获是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1981 年苏秉琦、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 年第 5 期), 并据此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 6 个考古学文化区, 开创了相关研究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结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 年第 2 期)、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 年第 3 期)、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等。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运用于考古领域也对考古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手段的代表性运用, 即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随着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 通过聚落形态和遗址分布考察来深化对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

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物质文化遗存与意识观念的研究,成为新时期对传说时代及文明、国家起源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思路。近年发现的重要遗址的发掘,极大地推动了对于新石器时代认识和研究。

此外,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著作也陆续诞生,相关讨论持续深入。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从考古材料入手,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相较于传说时代的渺无踪迹,由于相关材料渐趋丰富,学界对夏文化的探讨取得了更为确切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河南地区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大大缩短了人们认识夏文化的距离,提供了一条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通往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途径。90年代发现的河南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为研究夏文化的来源及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受到了学界重视。随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等发掘报告的陆续发表,逐步揭示了夏商之际宫城及其布局、手工和祭祀活动的更加具体的面貌。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年)、《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三联书店,2016年)等著作中对二里头、陶寺等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详细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上古中国国家起源、城址格局、新石器文化兴衰等论题,是基于考古成果探讨国家产生问题的新论著。

纵观40年来传说时代与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和成绩,学科交叉带来的综合效应越来越受重视,为多部门协作的组织、工作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化研究推动了对于考古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创新,客观认识和吸收西方考古学理论,并创造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考古理论和方法,推动文化关系、人口特点等方面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三、殷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殷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著名的《甲骨文合集》及《补编》以外,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殷墟附近出土甲骨主要分为3批。(一)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4千多片有字甲骨,收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上册图版,1983年出版下册释文、索引、钻凿)。此外还有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等。(二)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出土一坑甲骨,计1583片,有字者689

片,后整理出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相关研究参考齐航福、章秀霞《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线装书局,2011年)。(三)2002年殷墟小屯南地继1973年出土甲骨后,又出土甲骨600多片,有字卜甲、卜龟227片,这批材料编入《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一系列甲骨的发现及著录,逐步完善了科学发掘甲骨材料的著录体例。《小屯南地甲骨》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发掘单位(灰坑、房屋基址、墓葬)、出土顺序号,标明层位关系,便于探讨甲骨断代。下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甲骨钻凿作了系统分析,也是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于省吾主编、姚孝遂编撰《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汇集资料齐全、缕析细致、截断众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至于安阳殷墟、郑州以外地区商代甲骨文发现,主要是2003年山东济南大辛庄出土有字卜甲,对研究商王朝与东方邦国性质、商方国都邑等问题意义重大。这些资料整理者不辞辛苦、嘉惠学林的精神,至为宝贵。

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最为可靠的一手资料,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对新时期以来甲骨学相关研究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总结。而对甲骨文真伪认定、文字考释、缀合、文例、占卜形式等进行考察,可为殷商史提供良好研究基础。卜辞真伪问题,典型例子就是家谱刻辞。对此,早期学者已有争论,1985年李学勤等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公布了更为清晰的照片和拓片后引起学界又一次争论。至于文字考释,在前辈学者基础上,如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等成果,考释精审,取得了显著成绩。尽管如此,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仍十分艰巨。至于文法、语例研究,学界虽有涉及,但目前仍较为薄弱。卜辞缀合某种意义为研究甲骨提供了新材料,以黄天树为代表的学者多有收获,出版有《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及其《续集》(学苑出版社,2011年)。

甲骨的分期断代问题是研究甲骨文的前提。随着新材料出土,对董作宾提出的传统五期说,学界有了新认识,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 董作宾提出的“文武丁卜辞”的断代,亦即陈梦家概括为“子组”“午组”“自组”卜辞。小屯南地甲骨的科学地层为讨论提供了坚实证据。林沅《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根据子卜辞(含子组、午组)与宾组、自组同版、同坑及出土地层,进一步肯定其属于武丁时代。《小屯南地甲骨》上册“前言”指出宾组和自组卜辞地层关系、内容、文例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因此时代一致。同时也指出有重要不同,可能是前后关系。

2. “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1977年妇好墓发现后,李学勤首先提出“历组卜

辞”的概念,根据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同版等多方面论证,将传统归于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提前至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支持者有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1981年)、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1984年)等。为解释武丁至祖庚时期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李学勤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一为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另一系统为自组——历组——无名组。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最早将“两系说”系统化,按类型学原则根据卜辞字体及演变对卜辞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提出“自历间组”“自宾间组”概念。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天津出版社,1991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均支持两系说,并予以更具体的解释。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则全面探讨了“历组卜辞”的时代和分系。反对历组提前,坚持认为历组仍属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的论著,包括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三辑,1980年)及其《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九辑,1984年)、罗琨与张永山《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文字研究》第三辑,1980年)、曹定云《论武乙、文丁祭祀卜辞》(《考古》1983年第3期)、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等。关于甲骨分期的讨论,极大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水平的提高。

40年来,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趋系统、细致,研究内容涉及商代国家社会及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往有长足发展。这些年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

1. 卜辞中“众”的身份问题。相关讨论涉及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传统研究一直在奴隶社会前提下展开,改革开放后,学界重新审视“众”的身份,多认为“众”非奴隶,如朱凤瀚《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张永山《论商代的“众人”》(胡厚宣编《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等。

2. 商代宗法制及相关研究。花园庄东地“子”卜辞的发现,为商代家族形态和社会结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利用殷墟非王卜辞考察商人贵族家族的结构、经济基础和族长权力。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1983年)从商人内部阶级探讨商代社会阶级结构,肯定商代后期存在宗法制度。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从商王室的神主、宗庙制度等论证商代宗法制。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指出商晚期先王、先妣宗庙设置的原则主要在于是否直系;他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主张宗法制的核心是维护宗子在本宗

族内至尊的地位。从家族组织的角度认识商代国家结构,认为商王国的核心是商王朝与重要子姓宗族,商王通过宗法关系控制子姓宗族,也保证了对商王国内其他异姓宗族及被征服处于附属地位的部落的统治。

3. 商王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或认为商代存在封建诸侯制度,如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或主张方国联盟,如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1981年)提出8项确定商联盟方国的标准,运用“都鄙群”解释早期国家形态。宋镇豪《商王朝的国土经纬》(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也对商代国家结构进行探讨。或从家族组织角度认识商代国家结构。或认为商代存有多王,国家松散,如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的王与帝》、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的王族及相关问题》(均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

4. 集合示名研究,如大示、小示,上示、小示等,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认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旁系先王。曹锦炎《论卜辞的示》(吉林大学研究生处编《研究生论文集刊》1983年第1期)指出大示是上甲至示癸六示。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则认为它示是二示,是小示。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对这些研究作了总结。

5. 祭祀与宗教。对商人祭祀的研究中,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和《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是代表性成果。周祭是目前学界认识较为清晰的商后期王室的祭祀活动,是轮流以乡、翌、祭等五种祭祀逐日祭祀自上甲开始的所有先王和直系祖先的配偶的制度。而对殷人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帝是否为至上神的争论。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吴荣曾主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将商人神灵划分为上帝、自然神、由自然神人神化、非本于自然神的祖神,也认为上帝并不是至上神,也非商人保护神。

6. 商王朝官僚系统。相关主要成果有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1986年)、王贵民《商代官职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王宇信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等，这些成果考察了商代的职官种类、历史特点，对商周的职官体系进行对比。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文史》第 19 辑，1983 年）则提出侯、甸、男、卫由职官转化为诸侯的观点。

7. 花东“子”卜辞研究。花园庄东地甲骨属于非王卜辞，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子”的身份问题展开。专著有常耀华《殷墟甲骨非王卜辞研究》（线装书局，2006 年）、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线装书局，2006 年）、韩江苏《殷墟花东 H3 卜辞主人“子”研究》（线装书局，2007 年）等。

8. 族徽研究。从对族徽文字的考释，到对其性质的探讨，有姚孝遂“表意文字”说、林沅“早期铜器铭文”说、李学勤“族氏铭文”说、裘锡圭“族名文字”说等。学界主要就“复合氏名”进行了热烈讨论。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 年第 3 期）提出其为母族下的分支；严志斌《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中原文物》2002 年第 3 期）、《商周复合氏名探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2008 年）认为有共同作器现象；张懋镛《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的新思路》提出同姓可能是分支，异姓为姻亲说。对此问题的综合研究主要有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 年）。族徽研究与氏族、方国地理关系密切，学界对商代氏族由整理相关氏族铭文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氏族迁徙等问题，如曹定云《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黑白”墓》（《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2 期）。

甲骨文以外，考古材料、商代青铜器均是研究殷商史的重要资料。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发掘了新的考古遗址，如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并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垣曲商城：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年）、《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盘龙城：1963—1994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研究商代铜器铭文的专著有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等。

对殷商史的总体把握，宋镇豪主编的 11 卷《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是目前最为系统的著作，从多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考察商代史。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共 40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将难以觅见的甲骨学商史的著录及研究著作汇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重印了大量早期甲骨文学者的研究著作，嘉惠学林，成绩巨大。

大略来看，40 年来殷商史研究发展迅速，但研究中仍有较多不足，现有研究结

论也尚待进一步检验、完善。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简帛等新材料的出土,学界对殷商史研究的关注固然有转冷的趋势,但新材料如清华简所见“商书”的一些资料,也为从其他角度研究殷商史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这也是殷商史研究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四、西周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周史研究的推进,大体也可归为材料的发见与研究范式的创新两方面。材料的发见主要是西周时期甲骨卜辞及随着大量西周考古遗迹的发掘带来的大批青铜器的问世,研究范式的创新则体现在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这一旧有研究范式后,对西周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入探讨。以下即对这两方面简要说明。

西周甲骨多地皆有出土,数量较多、较为重要的主要有两批:周原甲骨和周公庙甲骨。

周原甲骨发现于 1977 年岐山县凤雏建筑遗址,计卜甲 16371 片、卜骨 678 片,其中带字卜骨 292 片。周原甲骨的陆续公布,引发了对诸如数字卦、“楚子”、“周方伯”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王宇信、徐锡台、陈全方、朱歧祥等都对周原甲骨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中,周原甲骨卜辞第一次全部以放大照片的形式面世,是目前利用周原甲骨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学界对周公庙甲骨的讨论也方兴未艾。截止到 2011 年,周公庙遗址发掘中已发现西周甲骨 10000 余片,可辨识文字近 2600 个,其中“文王”“王季”“周公”等人名已被发现。目前周公庙甲骨只有零星公布,系统研究尚未开始,是西周史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随着对西周遗址的大量发掘,除甲骨材料大量出土外,一大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西周铜器铭文也陆续发现。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青铜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青铜器、河南平顶山西周应国青铜器、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虢国青铜器、山西绛县柰国墓地以及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眉县杨家村、宝鸡石鼓山、扶风齐村所出鞅簋等器物的铭文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引起了学者广泛讨论。此外,一批私人收藏的重要有铭青铜器也被公布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首阳斋等的《首阳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和罗新慧主编《首阳吉金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这些器物的面世和研究,对彝铭所载西周史料的丰富都具有重要意义。

金文材料的运用,离不开著录、释文。除《殷周金文集成》及其《释文》外,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及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著录了《集成》未著录的新出铜器铭文。此外,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中华书局,2010年)提供了清晰的铭文摹本和准确简明的释文。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及《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将图像、释文与相关背景资料集中列出,也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时期,出现了系统地释读铭文以方便阅读和理解金文材料的著作。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此类著作中体量最大、印刷最精、最为系统的一部。此外,唐兰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虽只完成了穆王以前的铭文释读,但在断代和释读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陈佩芬《陈佩芬青铜器论集》(中西书局,2016年)也是一部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著作。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更是全面深入研究青铜器的翘楚。

改革开放后,新见简帛文献与西周史研究直接相关者不多,但近年来陆续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第七辑(中西书局,2010—2017年)中有一批“书”类文献,虽然写定年代是战国,但其来源很可能是西周时期,如《程寤》《保训》《厚父》等,或素来未见流传,或可与传世文献对读。《楚居》是楚人自述先人历史,详细记述了楚国迁都过程,可信度较高,对研究西周时期楚国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系年》对西周的很多记载不见于传世文献,史料价值极高,尤其是对两周之际历史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日益热烈的同时,学界对传统文献的梳理也从未停止。自“古史辨”思潮兴起以来,老辈学者已经对传世先秦典籍文献的成书时间作了全面检讨与研究。目前公认成书于西周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尚书》“周初八诰”和《逸周书》中的部分篇章。

近20年来学者对《逸周书》关注颇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007年修订)及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等。前者在《逸周书》文献的梳理、校对、释读上用力颇深,是研究《逸周书》可依据的较为详赡的注本。后者则多着力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系统整合,直面典籍性质、成书年代、史料价值等最重要的问题。“清华简”已公布了数量不少的“书”类文献,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对“书”类文献的讨论将再次迎来高峰。

西周年代学也是近40年学者关注的重点,西周诸王纪年问题始终是困扰学界的重要命题。此问题可分为两部分理解:一是诸王纪年的起点,即武王伐纣之年的考订,二是对西周诸王纪年的编排。

对武王伐纣之年的研究,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揭开了研究热潮的序幕。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而达到

高峰,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目前学界关于武王伐纣之年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

对西周诸王纪年的研究随着青铜器铭文断代,至今仍是金文研究的热点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编纂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朱凤瀚、张荣明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汇总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纪年的史料以及20世纪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周纪年的研究成果,但也未得出一致结论。此后,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张闻玉等《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青铜器铭文为主要材料,系统地推演西周诸王的纪年,亦各成其理。此外,韩巍所提出“恭王长年说”颇见创新,可成一家之言。

由此上溯到先周时期,周族起源是近代以来广泛讨论的老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考古资料的丰富,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周族起源成为新趋势。首开此风的是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此文通过对陶器和铜器器型的分析,尤其是对瓦鬲的器型分析,推演出一条先周文化的发展脉络,开创了考古器型类比、出土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西周史事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突破点在西周灭亡与两周之际。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从政治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对西周灭亡的过程及原因作出了新的解读。《系年》公布后,出现了自《竹书纪年》后最系统、最可信、年代最早的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记载,其中大部分史事不见于传世文献,尤其是关于“周亡王九年”等关键性记载,更是引发了讨论热潮。

除具体史事考证外,学者在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上也卓有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对西周社会形态的探讨开始逐渐向西周国家结构的研究转变。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研究周代国家结构的奠基之作。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三联书店,2010年)立足考古材料和出土铜器铭文,抛开时代争议不定的传世文献,得出极富新意的观点。

制度史研究向来是断代史研究的重镇。40年来,诞生了一批西周制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譬如,研究宗法制的著作有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研究职官、册命制度的著作有张亚初与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研究分封、采邑制度的有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天津出版社,1992年,2006年增订,改题《周代的采邑制度》);研究礼

乐制度的有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五等爵制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一直是讨论热点,近年亦有相关博士论文问世。研究社会生活的著作有常金仓《周代社会生活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研究家族形态的著作有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研究土地经济的著作有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对西周思想观念的研究,基本超出了西周断代的范围,专著也不多。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等是有代表性的论文。

纵观改革开放后的西周史研究,呈现新材料、新观念与新方法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学者们的深入探讨促进了西周史研究的大发展。

五、春秋战国史研究

改革开放 40 年来,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旨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跳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传统研究范式后,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渐深入,新出土材料成为研究热点,学者利用出土材料对春秋战国的年代、史事、文献、学派等问题作了深入考订,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方面研究也日益成为重点。

1979—1990 年间,学界对春秋战国史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生产力、生产组织结构、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变法等方面。学者们试图通过对以上议题的讨论,对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作出判断。

此时期对于春秋战国社会形态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林甘泉《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文物》1981年第5期)、崔春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瑞兰《略论战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来历及特征》(《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的变化》(《文史哲》1984年第2期)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5期)、吴荣曾《对春秋战国家长制奴隶制残余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以上论著对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形态作了概括性阐述。

由于学界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的探讨和关注,加上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背景,作为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的变法改革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主要成果有:祝

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黄中业《重评战国变法运动》(《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王育成《商鞅变法始年质疑》(《争鸣》1983年第4期)、朱凤瀚《关于春秋鲁三桓分公室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84年第1期)、斯维至《商鞅变法及其有关的问题》(《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徐中舒与唐嘉弘《略论春秋时代的变法改制及霸业》(《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也极大地促进了春秋战国史研究,代表性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及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诸器等。以顾颉刚、张政烺、李学勤、李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铭文及中山国历史作了讨论。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其中关于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材料,得以系统整理。而湖北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的发现则引起了学者对曾国的兴趣,杨宽、石泉、曾昭岷、李学勤等学者曾就此问题发表多篇论文。这也掀起了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关注,如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等,皆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诸子作为春秋末至战国时的独特群体也备受关注。1979—1990年间,学界对诸子思想的讨论集中于对先秦诸子的综合评价、学派比较和对“百家争鸣”现象的述评。代表成果有金景芳《战国四家五子思想论略——儒家孟子、荀子,墨家墨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1期)、乔长路《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学派划分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陈红映《先秦诸子起源新探》(《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等。以上论著对诸子思想的分析,多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划分的角度入手,呈现出较浓厚的时代特征。而新时期则对诸子生平、思想及著作的成书过程、成书年代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代表作品有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杨兆贵《〈鹖冠子〉新论》(澳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全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2)等。诸子文献的出土也为诸子研究增添了新成果。

考古发现所见的汉墓文字资料中也有关于春秋战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缭子》《晏子》(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5年)等在此时得到了深入研究,陆续刊布的阜阳汉简,也为研究诸子学说提供了新材料。

1990年至今,春秋战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特点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材料的不断丰富,出土文献成为促进春秋战

国史事及诸子思想研究的主要动力。

社会阶层的变迁是研究社会形态的重要问题。此时期,学者们普遍关注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涌现出一批讨论“士”阶层的成果,如王泽民《春秋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文化性格》(《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马卫东《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社会阶级的变迁也表现在经济形态的变迁上,因此,学界开始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与商业发展问题。此时期关于土地制度的主要成果有:林剑鸣《井田和爱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林鹏《晋作爱田考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李孟存与常金仓《对〈晋作爱田考略〉的异议》(《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李瑞兰《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由来、特征及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郭豫才《论战国时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再论我国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李修松《初税亩辨析》(《安徽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张玉勤《论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等。通过对春秋战国土地制度的具体分析,试图廓清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而认识社会阶级的分布状况及其关系。

作为经济运转直接体现的商业制度及币制,以及商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杨生民《论春秋战国的市》(《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杜勇《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张宏《战国秦汉时期私商类型叙论》(《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均是其中代表。

不同于此前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形态的情况,此时期,学者的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思想观念、习俗、官制等议题都成为研究热点。思想观念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三联书店,2002年)、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另外,徐勇《论春秋时期管仲和齐桓公的军事改革》(《历史教学》1996年第8期)、陈伟《春秋时期的附庸》(《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研究成果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新出之春秋战国青铜器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肖梦龙、刘伟主编《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彭裕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其次,一批重要简帛资料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风俗、信仰、诸子思想以及文献流传的研究提供了新助力。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简为研究思孟学派、人性论、《老子》一书的流传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2001—2012年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共公布9册,其中多篇简文对研究《诗经》研究、性情论、上古帝王传说、文献流传有重要意义。这批新材料出现后,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汇集并订正资料和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创造了便利,很为学界欢迎。

面对简帛材料大量出现,不少学者也对文献流传、学派划分问题进行了反思。代表性成果有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四辑,2013年)、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一)——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春秋战国史研究的成就,可以看到,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与研究范式的自觉革新,是促成此历史成就的重要原因。但学界应意识到纯粹的出土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应当以更加系统的思维来看待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放远目光,促进史学研究向着更加繁荣的方向持续进步。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总体看来成就巨大,进展迅速。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是甲骨、金文、简帛等重要考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成绩突出,促进了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二是一批标志性重要成果的出现,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宋镇豪主编《商代史》、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等,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面对已有成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目前的先秦史研究待整理的新材料、待研究的新问题、待开辟的新领域还比较多,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还需要学界持续努力,发扬创新精神,进一步开创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张欣)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长琦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1978 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始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时,中国史学也与中国学术界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 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发展同步,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彷徨、探索之后,走上了正常的、稳定的发展道路。

一

中国史学 40 年来的发展,可以以 1989 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8 年到 1989 年,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的彷徨、探索期,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彷徨、探索期。1989 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稳定发展时期。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开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史学界在兴奋中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复苏。对过往史学研究道路、研究课题与成果的评价和思考,接连引起一场场热烈的、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影射史学”受到清算与批判,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在讨论中进一步清晰,以“五朵金花”为喻的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过去研究的热点问题被重新提出和再讨论,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民族融合问题、土地制度问题等一度成为研究热点。1981 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1984 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两个学术研究组织的建立,集聚了一大批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成为组织与开展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术活动的中坚。一批年近古稀的学者推出他们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一批中年学者奋发著述,逐渐成为学术的领军;一批青年学人锐意进取,开始崭露头角。一时间,史学研究的热潮蓬蓬勃勃。在这史学研究的勃兴中,一批中青年学人开始对史学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思索并产生彷徨,一些

人则对史学由“文革”中的“庙堂之学”地位跌下感到失落,“史学危机”论随之而生,其实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学术,史学本身并不存在危机,但“危机”作为一种来自主观的感受,其主流心态所表达的则是部分青年学人对新时期史学研究方向寻求的焦虑与彷徨。在彷徨中、讨论中,人们开始了对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新领域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热”席卷史学领域,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概率论、统计学等应用于史学研究领域,成为史学方法革新的热门话题,同时,“回到乾嘉去”的呼声,也一再响起。正所谓“一致而百虑”,这种新时期初期史学的百家争鸣,推动了史学的发展,所反映的其实是史学探索中的繁荣,而不是“危机”。

1989年迄今的近30年,属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正常的稳定发展时期。1989年之后,史学研究的队伍逐渐实现了新老交替,在老一辈学者的关心培养下,1978年之后入学的本科、研究生,特别是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后毕业的硕士、博士,逐渐加入史学研究队伍,成为生力军;史学理论与方法探索的热情逐渐冷却、大规模讨论的热潮逐渐消退,冷静的思索代替了热烈的争辩;史学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与课题选择的多样性,取代了过去的统一与单调,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在大浪淘沙中,学者逐渐分化,史学实现了由“庙堂之学”向“人文之学”本位的依归;务实、求真的学风回归于史学研究,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正常的、稳定发展之路。这近30年来的史学,无论从广度与深度上,都超越以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亦呈现视野开阔、方法多元、领域宽广、成果丰硕等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的开通、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开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开发以及大数据的运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我们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运用大型古籍数据库,例如利用《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我们可以轻松实现史料的海量检索;运用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学术研究动态;运用互联网,我们可以与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国内外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链接,检索与查找学术资源,与地球任何一端的学者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互联网的开通与数据库的建设运用,令我们学术研究的工具与手段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并深刻影响着史学研究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热烈讨论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现象已不多见,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已渐为常态,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都有各自表达的空间,传统史学考据法、二重证据法、系统论、统计学、制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乃至近年来“史料批判”等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运用,呈现出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向着更宽广的领域拓展,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

史、文化史之外,更多的学者在社会史、生态史、历史人类学、宗教文化史领域开拓,史学研究真正实现了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

40 年来,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具体体现于以下诸方面:

(一) 简牍、碑刻、墓志等新材料的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严重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面。

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其他断代史研究领域不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成果的取得,除学术环境的改善、研究方法的改变、工具与手段的进步之外,还得益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受赐于简牍、碑刻、墓志等一系列考古资料的发现。

传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主要依赖于正史材料,即秦汉史依赖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史依赖于“一志二史九书”(《三国志》《南史》《北史》《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1975 年 12 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是有史以来秦简的首次发现。在考古与史学界的努力下,1978 年 11 月,文物出版社即率先推出了包含释文与译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此后,又相继推出了包含图版的精装本及线装本。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发表的第一批秦简,这批秦简的整理效率之高、面世之快,其所创造的时间记录之短,至今没有能够被打破。秦简的研究带动秦汉史研究走向了热潮。继云梦秦简之后,张家山汉简(1983 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0 年)、尹湾汉墓简牍(1993 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 年)、里耶秦简(2002 年)、长沙走马楼汉简(2003 年)等一大批重要简牍被发现,以及《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 年)、《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居延新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 年)、《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 年)、《里耶秦简(一)》(文物出版社,2012 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荊》(文物出版社,1999 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文物出版社,2003—2015 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至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015 年)等一批重要简牍释文相继出版,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改变了传统研究严重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面。据粗略估算,目前发现的秦汉简牍数量有 135000 多枚(据谢桂华等于《历史研究》2003 年第 6 期所发表的《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统计,2000 年前发现的秦汉简牍

有8万余枚。而2000年以来,2002年发现的里耶秦简有36000余枚,2003年发现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有1万余枚,2006年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2100多枚,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收购秦简有2174枚。2015年发现的南昌海昏侯墓汉简有5000余枚,零星发现的还有广州秦汉南越国遗址简、郴州汉晋简等,21世纪初以来,已发现秦汉简牍55000多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有14万枚以上(仅1996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就有14万枚)。这些简牍如最终能够全部整理出版,字数将达600万左右。在此,我们应该向从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事业的学者表达敬意与衷心感谢。

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对秦汉史、三国史研究的影响巨大,如今简牍材料已经成为秦汉三国史研究的必要参考,没有简牍材料也就没有今天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的繁盛局面。在对秦汉简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吴简的研究有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陈荣杰《走马楼吴简佃田、赋税词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骈宇騫与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则对近百年来主要的出土简帛资料进行了全面的疏理,如《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分“资料篇”“论著目录篇”“综述篇”,用90万字篇幅,系统介绍了简牍发现与研究的历史。

简牍之外,宝贵的考古资料当属石刻资料,主要有碑刻与墓志。历史的原因,汉代流行碑刻,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墓志,由于碑刻立于地表,难以保存,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碑刻很少,而墓志材料则随着墓葬考古有大量出土。尤其是河南洛阳的魏晋南北朝墓、江苏南京的东晋南朝墓都有大量的墓志发现。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虽所收新碑不多,但汇集作者多年对汉碑的研究成果。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的基础上补充收集了1949至1986年间全国出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则收录了1986至2003年间全国出土的魏晋南北朝墓志,2016年又出版了修订本。

(二) 断代史研究步入平稳发展期。断代史研究,属于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

的整体性研究,1978 至 1989 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曾经一度出现过热烈的局面,相继有多部断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问世。1989 年之后,断代史撰写之风慢慢平息,断代史著作渐渐减少,至今已进入平稳时期。全面的断代史研究,对于学者来说,属于难度较大的课题,它不仅需要理论的修养,需要具有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既需要传统史学所讲的“识断”,还需要对史料的整体把握,对史学研究前沿问题与进程的把握,有赖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继承。否则就会失之空疏,流于浅薄。代表性的成果有以下几部: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是张传玺等对翦先生 1946 年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二卷进行整理校定的著作。作者长于理论,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和解读史料,语言富有文采,可读性强。他以西周封建论的视野,将秦汉社会放在中期封建社会的框架内解说,曾产生重大影响。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是 1978 年后出版的第一部秦史,该书将秦人的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史分为三个阶段,论述了秦兴盛、衰亡的全过程,是少有的秦史专著。但今天来看,不免时代的局限,当时史学的热点在书中留下了些许遗憾。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 年)上下二册,是马先生于 1979 年 84 岁时所抄录完成的、近 80 万字的秦史专题资料集。马先生少年立志编写秦史,想在史学史上留下一段“三马(马端临、马骕、马非百)三史(《文献通考》《绎史》《秦书》)的嘉话”,无奈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研究中断,待到平反时,已 80 多岁高龄,无力写作,梦想化为泡影。因此,只得在编辑的建议下,将毕生所收集的资料抄录出版。其体例依纪传体史书,分纪、传、志、表,对涉秦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整理,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还包含了 1978 年刚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它虽然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断代史专著,但其体例与思路还是可以为我们的参考。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年)对秦文明的认识,富有启发。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上下册,注意吸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秦汉史研究成果,重视简牍等考古资料,对秦汉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是作者有关秦代制度研究的论文结集,利用出土资料和文献,对秦的土地田制、租赋徭役、乡里户籍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秦为官社经济体制,其基础是土地国有的普遍授田制,特点是政社合一等看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1980 年)上、下册,是作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结晶,全书近 80 万言,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属断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 年)汇集作者多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心得,虽言史纲,但有 45 万言,其逻辑严密、疏而不漏,承袭了作者史纲著作的一贯风格,为纷乱复杂的魏晋南北朝史勾勒出清晰的线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 年)是一部运用札记体例考订魏晋南北朝史实、名物、制度的著作,考订内容涉及《三国志》《晋书》等 12

部正史,成札记340余篇。其征引之博,考订之深,涉及面之广,为历年来所仅见,可绍续乾嘉考史诸名著。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一部从宏观角度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发展变化的著作。该著由魏晋封建论的视角出发,论证了魏晋时期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北南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揭示魏晋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是“奴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一是“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二是“门阀制度的形成和九品官人法的确立”,三是“玄学兴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深化了唐长孺的旧有观点,也深化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由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5卷和第6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约110余万字,是目前篇幅较大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该书力图在编写体例与方法上有所创新,其兼采传统纪传体与近代章节体史学编纂之长,改变了近代以来历史著作重理性概括、轻人物描述的趋势。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时间性的断代史与区域性的断代史有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以及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张承宗等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简修炜等《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

(三) 政治史研究取得明显突破。政治史研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题,无论是发表论文、著作的数量、质量,还是涉及问题的广度、深度方面,都前所未有。政治过程、政治事件、社会性质、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豪族、门阀世族、贵族制、寒人政治研究都积累了大量成果。政治制度史研究,在秦汉三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军功爵制、郡县制度、乡亭制度、察举制、秩俸制度、九品官人法、官品起源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突破。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的认识,学者多从社会形态学理论出发,考察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性质,如林甘泉从战国封建论观点出发,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说,认为秦汉属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认为,现行“封建”概念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为概念的误植,秦以后没有封建社会。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点。近40年门阀政治研究在唐长孺、宫崎市定、王伊同等人的基础上成果不少。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归纳为士族政治、门阀政治或贵族政治,通过对东晋一朝重要家族及政治史相关问题的考证,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是特定条件下士族利用皇权、驾驭皇权以控制政局

产生的特殊政治形态。这就突破了以往的认识,为重新解释魏晋南北朝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北魏定都平城时代的历史。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洋洋数百万言,是目前最为详赡的一部北魏政治史。

在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综合性的研究有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985年)上、下册,全书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三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官僚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总结。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讨论了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渊源、流变和运作的基本形式,揭示了秦制、楚制对汉制形成的影响。

专题研究,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三部著作,深入考证了军功爵萌芽、确立、发展、鼎盛到衰亡的全过程。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的构成及变化、宰相与皇权、秘书咨询机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以缜密的考证为基础,梳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察举制的演变过程。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以“品位—职位”分析框架,讨论了这一时期官阶制的变迁,认为汉代禄秩从属于职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出现的九品官品制度,继承秦汉禄秩等级,开启了传统官僚等级制的又一阶段。陈长琦《官品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6年)认为官品起源于九品官人法,原本属于任官所需的“官才之品”,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孝文帝改革、南朝的梁武帝改革使官品实现了向官阶性质的转化。

九品官人法或曰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是制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运用系统论,将九品中正制纳入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仅仅是诸选官系统这一母系统之下考核子系统中的一个考核环节、考核层次”,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选士功能,更没有授官功能”。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集中讨论了概念的确定、官品的性质、官品与资品的关系等问题,推动了九品官人法或九品

中正制研究的深入。

40年来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制的许多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陈仲安与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以及牟发松关于行台的研究,均对各自领域有深入的开拓。

(四) 法律史研究改写了旧认识。传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受材料的局限,一直难以突破,如程树德的经典名著《九朝律考》,对秦律的研究只能付之阙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简等大批法律文书的出土,使法制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秦汉法制史研究长期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围绕着秦简、汉简而出现了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热潮,一些新论著、新观点不断产生,旧认识被改写。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安作璋与陈乃华《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张功《秦汉逃亡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一大批著作纷纷涌现,改写了秦汉法律的旧认识。

传统的认识中,秦律是由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六篇改编而来,汉律是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由萧何增加三章而成,故汉律亦称之为九章律。但在张家山汉简中,我们所看到的汉律之名,远远不止于九。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我们所看到的秦律之名,也远不止六。对此学术界产生热烈讨论,李振宏《萧何“作律九章”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均主张九章律的“九”为虚数,汉律篇章不限于九章。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提出了新解读,认为秦律、汉律篇章存在一、二两级分类,简牍中不见于九章的律篇实为其下的二级律篇。

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的著作,该书从过往学者关注不多的敕例入手,梳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发展过程,通过讨论魏晋南北朝的敕例与法律体系的关系,澄清了唐代《律》《令》《格》《式》体系的源流。

(五) 民族史研究获得丰硕成果。拓跋鲜卑的起源与早期居住地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62 年) 就根据文献, 推测鲜卑得名的大鲜卑山所在地, 提出“大鲜卑山当在今大兴安岭的北段”的论断。1980 年在内蒙古鄂伦春旗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 使马长寿的推论得以证实, 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著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 年第 4 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对此有进一步的廓清, 解答了学术界的疑惑。这应该是 20 世纪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三部著作, 是该时期民族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 匈奴、东胡、突厥是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 特别是匈奴与东胡,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影响巨大, 突厥虽然后起, 其影响主要在隋唐, 但在北朝后期已对北朝历史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穷毕生精力, 完成了这三大民族史研究“工程”, 部分成果还填补了民族史研究中的空白。另外他还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与再思合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等著作出版。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提出了自己对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他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分导论、上编、下编三部分, 是作者所发论文修改、充实并系统化的结集。其上编对羌族、氏族、南匈奴、乌桓、鲜卑、卢水胡等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 下编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民族政权、民族战争、民族观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与民族政权进行了系统的考述。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从通史的角度, 系统论述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的关系。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 2003 年) 是作者关于拓跋鲜卑研究的结集。该书以缜密的考证, 论述了拓跋早期历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如代北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离散诸部、子贵母死制的建立等问题, 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 认为拓跋一词和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 tabya 一词, 都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的音译, 这个北族名号原来是由两个词联合构成的复合词。其性质及两个部分的功能, 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名称有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曹永年《古代北方民族史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收录了作者关于拓跋鲜卑源流研究、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等重要论文, 提出了富有启发的学术观点。

(六) 经济史研究摆脱了旧的束缚。以往的经济史研究,偏重于农业经济,偏重于农业生产中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研究,显得单一和薄弱。1978年之后,这一状况得以改变,旧的研究观念、研究模式的束缚被摆脱,区域经济、部门经济、产业结构等过去很少研究的问题得到重视,课题选择的多元化渐成趋势,经济史研究出现繁荣局面。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20世纪秦汉经济史研究的总结之作,体例宏大、结构完整,系统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生产单位、产业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讨论了过去研究薄弱的财富分配、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经济等问题,提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性生产,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互相补充等观点。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对秦汉土地制度、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劳动者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辕田(受田)制属于国家向农民授田,名田制是国家向立有军功者的赐田等观点。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对秦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土地所有制形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对秦从中央到地方的手工业管理组织与模式、将作与工官等生产部门、工匠等劳动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一些过去忽视的问题。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对汉代手工业生产诸部门如冶铁、陶瓷、铜器、玉器、盐业等行业的生产状况、工艺技术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齐涛《汉唐盐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业起源与盐铁专卖制度。此外还有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货币研究方面,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秦汉货币制度、货币流通与经济的关系、货币政策与货币思想等问题作了系统考述。

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发展水平。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主要集中研究了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及区域经济诸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主要有三国屯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较全面地研究了这一时期土地制度中的主要问题,如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讨论了户籍制度与阶级关系等问题。西晋的占田与课田在学术界聚讼纷纭,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赵向群《西晋课田法新议》(《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指出,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而是与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童超《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也

不属于限田制,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只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高敏《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则从“占”字的含义角度,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黎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认为,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

涉及北朝均田制的成果主要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

(七) 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在新史学看来,社会生活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历史并非只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关注民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近40年来,在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也逐渐关注社会生活的研究,关注下层民众的历史,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社会风俗中具体习俗的形成,大多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学者们在关注社会风俗时,首先重点关注的就是布罗代尔提出的中时段的社会风俗的具体情形及其转变,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综合研究,具有开拓性与创新性。区域社会史探索中,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亦有可贵的收获。王子今《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涉及秦汉社会史的诸多方面,多有创见;他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和该领域多种研究论著,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考察秦汉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的关系,发人深省。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系统展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基本状况,如衣冠服饰、饮食习俗、城市宫苑、园宅、交通、婚姻、丧葬、宗教信仰、鬼神崇拜、巫卜、节日、文娱、教育、医药等,搜罗宏富,考证严谨。

礼制的研究拓展了文化史的内容,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将传统的礼制,纳入礼文化的角度考察,区分礼学、礼制、礼行、礼俗等概念,在细致考证的基础上,建立了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研究的框架。

经学研究。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作者中国经学史系列著作(共4册)

中的第一、第二册,以汇通的视野,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史进行了深入考察。一些学者将视野转向经学、儒学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

玄学的研究。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将魏晋玄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正始、竹林、元康、东晋四个时期,讨论玄学与佛教、玄学与道教的关系,以《庄子注》解剖郭象的哲学思想,提出郭象是玄学发展的高峰代表。王葆玟《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不同意郭象为玄学发展的高峰代表之说,认为“在玄学史上,正始玄学既是初创期,又是高峰期”。与上述从哲学角度研究玄学论著不同,从史学角度研究玄学的则有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中国文化的清流——正始之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等。

汉代是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创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的历程,道教在此时也才大体完成经教体系的构建。总体论述宗教的有许抗生等《六朝宗教》(南京出版社,2004年)。

佛教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的前两卷和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都是继汤用彤之后,研究汉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系统著作。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对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等重要的佛教人物均有专论。道教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等。

思想史研究方面,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是40年来这一领域成果的突出代表。

三

40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取得了超迈既往的成绩,限于篇幅,特别是囿于自己的视野,难免挂一漏万,错误百出,很多成果没有谈到,恳请方家谅解。在肯定所取得成绩的同时,还有一些待努力改进之处。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在史学研究繁荣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深深的隐忧。一是论

著的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伴随着论文、著作出版的大量增长,泥沙俱下。许多没有创新、不具备学术价值、低水平、重复性的论著混迹其中,这不仅影响学术研究的价值、影响历史研究的社会评价,还深深影响着一代学风。二是严谨、扎实的学风亟待阐扬。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20 世纪是一个大师与名家辈出的时代。王国维、陈寅恪等不仅开创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良好基础,也显示了严谨扎实的学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检索手段的开发与利用,便捷的文献检索极大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过去需几年才能通读一遍的古籍丛书,如今短时间内即可翻检完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研究工具的进步,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助长了人们过分依赖工具、浮躁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人读书不认真、系统,靠检索软件写论文的状况。有经验的学者都知道,单靠电脑检索,没有系统读书的人,不仅缺乏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甚至缺乏基本的历史感悟,难以进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大量电脑炮制的论文,助长了浮躁的学风,也是垃圾论文产生之源。在工业信息文明迅猛发展之今,我们应正确利用工业信息文明发展带来的便利,发扬认真读书、严谨治学之风,惟此,才是学术长进之福。展望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

1. 敬畏学术。史学的本质是求真,是传承人类文化的精神活动。我们当怀抱敬畏之心研究史学,不能亵渎它,不能视之为服务于某种价值观的工具,也不能用之为谋取名利的手段。40 年来,学术环境的改善与稳定,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不折腾”,即学术不受非法干扰之贵。试想 1978 年之后,如果仍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史学为某某服务的口号天天喊,批判“右派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棍子天天打,怎能有今天的史学发展局面?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追求。

2. 加强史学理论学习与探讨。史学属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它涉及面广,包罗万象。从事史学研究,既需要掌握人类认识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亦需掌握具体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的分工、细化,使研究方向趋于断代与专门史的方面增强,对研究者知识体系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的研究者不仅需要一般的史学训练,更需要解读历史的专业学科素养。广义的史学理论,应该包含具体的学科理论。譬如从事政治史研究的一定要懂政治学理论,经济史研究要懂经济学理论,文化史研究起码要懂文化人类学理论,思想史研究起码要懂哲学。这使我想起前几年,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封建”问题,从所发表的论著与观点来看,许多置身其中、热烈表达意见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理论掌握并不充分,往往不能准确的使用和区分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如国体、政体、国家结构概念,以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如,中国古代的“封建”概念,用现代政治学来看属于国家结构的范畴,封邦建国所出现的封国林立局面,使国家的整体与部分间形成松散的结合,而近代以来翻译和借用的“封建”一词,则属于“国体”范畴,往往在描述社会性质的范围内使用,属旧词新用,已经脱离了其旧有的内涵。又如,现在普遍使用的“经济”一词,古代“经济”指“经

邦济世”，属政治范畴，而今天的经济则泛指人类物质生产生活以及交换活动。只有准确地运用政治学的范畴，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深化政治史的研究，同理，只有准确把握具体的学科理论，我们才能深化各专门史研究。

3. 经典文献与基本文献的掌握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构建新时代的史学？很多人已经思考和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在此只是想强调，面临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功。传统史学研究强调经典文献、基本文献的阅读与掌握，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者来说，从《史记》到《隋书》这 15 部正史，应该是我们需要精读的基本文献。这些基本文献为我们保存了较为系统的史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文献，把握这些史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掌握基本的文献，我们才可能具有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否则研究者不可能在具体问题上获得深刻的认识。计算机能够使我们快速地获得史料，但不能使我们快速获得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靠电脑检索写出来的论文与靠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写出来的著作有天壤之别，浅薄与深刻，立马可判。譬如我们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那种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刻体悟、史料的融会贯通，是透过文字跃上纸面的，是有生命的。而一些靠电脑检索写出来的论著，缺乏对历史的总体把握，更缺乏时代的体悟，因而议论浅薄、语言苍白、没有生命力。所以，我想强调，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深入发展，在积极运用出土简牍、碑刻、墓志等考古材料，在善于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工具的同时，不可忽视对基本文献的系统阅读与掌握。

(责任编辑：张 欣)

欢 迎 投 稿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学术总结是一个时代学术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指归,其总结的学术脉络也绝不与他人相同。对于 20 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行过总结。其后,又有学者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学术进展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有的是全面总揽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话题进行综述和展望,体现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参考的总结性和展望性综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揽才 造就群英——首届唐史高级研究班纪事》,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张广达《〈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一》、谷川道雄《〈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二》,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 年第 4、5 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郝春文《敦煌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年轻学人发表的就某一专题进行反思的综述和评论文章,结合学术最新进展,呈现出深刻的知识关怀和方法论探讨。这些总结和反思,是本文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已有成果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都是站在个人立场和有限知识范围内做出的。即使文中涉及的内容,许多方面也是表面归纳或借助他人的评述。超出本人知识范围的大量研究领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只能付诸缺如。好在如今资讯渠道极为发达,本文并不承担开列论著目录的功能。

一、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学术轨道。1979 年由唐长孺主编(署名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一辑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6辑,成为包括隋唐五代史在内整个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80年由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收录了众多魏晋隋唐史研究论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二编》。陈寅恪提出的相关概念和范式,构成了随后一段时间研究的叙事平台和逻辑起点。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推选唐长孺为会长。会议论文结集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于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汪篯遗作《汪篯隋唐史论稿》、黄烈等主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和1982年岑仲勉《隋唐史》(修订重排版)、金宝祥《唐史论文集》陆续出版。1982年出版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共出5辑),1983年出版了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6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8年出版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唐长孺主编《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分册)和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一、四辑(其第二、三辑出版于1987年)。这些学术成果的推出,无疑标志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全面正常开展,而且基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年)、王兴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年)和《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4年)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陈寅恪之后第二代唐史学者进入到学术盘点的阶段。

前举在世纪之交进行的学术总结工作,与其时的研究状况是相适应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主体还处于继承与盘整阶段,基本还是站在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以来第一代唐史学者的研究基点上展开的史事钩沉和论题铺排,以及站在以唐长孺、汪篯为代表的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又特别注重史料考证的第二代唐史学者研究基点上的理论推演与史料辨析。这些研究成果的总量巨大,但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论题的开拓却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由量的积累带来的质的突破,只在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含吐鲁番文书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等少数几个方面有所呈现。这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成绩冲击下做出的回应,一时间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率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参见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

所谓继承和盘整,具体说来,主要指政治史、官制史、法制史、财政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等领域,基本是接续传统议题而做出的进一步细化研究,无论从资料发掘整理还是史事铺陈解读,都还有一定空间,尚未遇到穷途和达到全面整合的程度。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有学者将20世纪前半段的研究特征概括为文化史观中国化、唯物史观学术化和古史形态理论化,这几个方面的进展以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等学者取得的成就为主线(孙继民发言,见陈瑞青等《“唐

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信息》2005 年第 3 期）。再加上岑仲勉、汪钱、韩国磐等人的研究，依然作为 1980 年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体知识体系，大量研究论著是在这些前辈学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化。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打破条条框框的隋唐政治史研究，就是一种细化和深化。尽管有些问题长期未有突破，如牛李党争就被称为唐史研究的“难解之结”，但一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一辈学人和 50 年代开始进入学术界的中年学者，通过传统的史料考据和新接受的阶级分析方法，突破了官方史学教材中有关隋唐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探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真相。例如黄永年直指“废王立武”是高宗摆脱元老重臣的斗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挑战的不是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其失败是注定的。唐高宗的所作所为是乾纲独断，而非听任武则天指挥，唐高宗也不是昏懦之君（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

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十分显著却颇具时代特色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对西方理论与议题的复制与套用。1980 年以来史学界以社会史和文化史为代表的研究领域的扩张，总体上也还处于催生或复制议题、生吞活剥地将外来概念和研究论域套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初级阶段。一段时间里，史学界的热门议题许多都是受到当时翻译引进的西方思想家（90 年代以后又加入了海外汉学家）著作影响而提出的，例如国家与社会、社会流动、精英群体、族群认同、日常生活史、地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等。这是学术史意义上对外开放之初的特有景象，对于冲破思想禁锢和僵化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复杂内涵的认识也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抽离这些思想、概念和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而加以机械套用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与套用之后，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深化对自身历史特征的认识。但这些业已引进的概念和话题，经过一定的语义与视角转换之后，逐渐与中国历史实际或史料特征相磨合，进而形成用以描述中国历史的“本土化”概念和话语。不过，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跟风式的对西方概念和方法的模仿和套用现象并不突出，也因此显得理论色彩不够浓厚。无论是继承整合，还是复制套用，历史学科的特点是，只要是严谨务实的研究，一旦落实到历史资料的梳理，相关认识总是能够有所推进。

在正常学术研究中断 20 年之后，改革开放最初 20 年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局面被描述成以下几个方面：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和文化史的别开生面。除了这些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呈现的普遍现象之外，还有一条是本断代研究的特殊情况，即敦煌吐鲁番研究与唐史研究的相得益彰（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站在世纪之交的学术现场，从整个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这样的描述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中呈现出来的成就感也契合彼时的语境。

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可以用来区分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阶段，但为了便于叙述，还是需要将其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则是90年代中期至今,本文概称之为前后两个20年。这个区分并不严格,有些90年代中期以前的成果可以划入后一阶段,反之亦然。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则可举1994年底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及相关学术活动的展开,其学术成果基本面貌的呈现则大抵要到90年代末,主要是《唐研究》专刊及“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出版。

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唐研究》的出版“在当前强调学术整合的思潮下,有着特别的意义。《唐研究》强调新史料、新见解,将使刊物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较高的学术品位,其突出书评的篇幅,并藉以总结学术史和建立严格学术规范的努力,也将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刘后滨《从〈唐研究〉(第一卷)看当前唐代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刘后滨《从〈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1996年“首届唐史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及同年年底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其宗旨就是要“促进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唐史专家更快成长,形成一个对21世纪的唐研究有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唐研究纵横谈》,第226页)。参与研讨班和发表文章的那批学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纪之交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力。这个活动本身也预示着学术新生代即将或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学术转型的霞光在一种集体焦虑中初显。2002年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是对整个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并在学术反思中试图提出新的研究取向。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领域的研究积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不必以新世纪到来为界)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学术规范的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研究领域也极大地拓展,社会史、区域史、妇女史、财政史、礼制史、法律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等分支,都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论著。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方面,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史料的整理以及各种传世文献的补遗,同样成绩卓著。可以说,无论从专题研究还是资料整理方面,从主流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或者说领先水平,隋唐五代史上许多方面的知识都得到补充和更新。

不过,无论是接续传统议题的细化研究,还是套用外来概念的类比研究,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当然,突围的努力也从未间断。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一些核心话题的提出,往往以一些重大理论预设(科学假说)为依托。就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例如中古士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唐宋变革问题、城市革命问题、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与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分期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提出者和最初的一批讨论者大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学术影响力的辐射下,这些话题提出后,一般都能够以其惯性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而且话题切分得越来越细致,尽显专门深刻。但是,随着大的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受惯性作用而产生的深刻研究,也出现与相应学术命题被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相脱离而流于个案化、具体化的趋向,导致碎片化且缺乏方向性,大量的研究因此陷入同质性的重复。最近几年走向学术前台的中青年学者中间,已经有一些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回到核心议题提出时的理论语境,吸取大量个案研究中的有效积累,对接 20 世纪上半叶(从 20 年代社会史论战到 60 年代)的中文学术背景,实现又一轮的知识整合和议题更新。

二、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由于学术产出大量扩张,学术成果的综合性水平不断提高,个人阅读量难以覆盖,甚至那些重要的论著也无法一一浏览,所以书评及学术综述和总结之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和反思之作颇多,各种分类和分期的学术总结文章,对于促进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年轻学者和在校博士生中间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低水平重复的论著,不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论著,已较为少见(尽管实质性的论辩交锋不多)。以下将在这些综述类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阅读和研究体会,就 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简要归纳和评述。

时代定位是任何历史断代研究的全局性问题,由此展开的以何种视角和线索来定位,来进行历史分期,就牵引出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和阶级关系等方面涉及社会形态与结构意义上的问题,例如权力结构与国家形态之类。

20 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在中国学术界曾经集中讨论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分期框架中,还是在日本学者争论的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时代分期理论中,隋唐五代都被强调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由于隋唐两朝在政治血缘上都接续着北周政权,从各种制度现象上看也与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有很大连续性,所以在实际研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侧重探讨隋唐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延续所呈现

出来的时代特征。隋唐史研究中许多定性的问题,往往都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带过来的。随着跨越魏晋和隋唐两个时段研究的充分展开和深入推进,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日渐呈现,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发生在南北朝隋唐之际的深刻历史变革。再者,还在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时代,加藤繁就认为唐宋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两个时代实为一体,没有差别。唐宋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一致立场(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1号“宋元专号”,1991年,197页。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种认识随着日本史学界论著的译介,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近10来年间,在宋史研究取得全面丰收的助力下,唐宋之间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延续性又得到重视,如邓小南等学者认为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文化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任何历史分期的做法都是为了建立分析历史变化或变革的坐标系,而所探索变化内容的不同,自然导致坐标系的不同。1982年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变迁》(《哈佛亚洲学报》第42卷第2期)指出,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的下放,具体表现在“路”的出现和“县”的独立性的加强。韩明士(Robert Hyme)进一步申说两宋政治社会精英政治作为和社会作为的转变,划出北宋、南宋之间的分野,以把握南宋和后世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北宋可视为唐代的延续期,南宋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唐宋之际的变革。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的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展看,南宋与北宋相比尽管发生了变异,但是变异不等于断裂,在这一变异时期,延续仍远大于断裂。近年来围绕《天圣令》展开的唐宋之间礼法与社会变革的研究,也涉及唐和宋(尤其是北宋)之间的延续与断裂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唐与两宋之间的差异大于延续,也有学者认为唐与北宋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两宋之间的差异,南宋与北宋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

新世纪以来,东亚学术界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有过集中的讨论,充分认识到内藤假说提出的理论关怀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意在探讨唐宋之间历史转变的意义,强调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相当于欧洲近代早期的“近世”,跳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王朝更迭和朝代循环模式,以回应西方长期流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而随着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等理论论争的退场,内藤假说空余唐宋差异的比较方面,深入一些的讨论则涉及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这已经是内藤假说的另类借用了。包括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和近世的过渡期之说,也被借用为“唐宋变革期”而广泛使用。可以说,中国学界对内藤假说的借用与展开,并非沿着此说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被阐

发和论争的逻辑,因为中国自南宋以来就不断有唐宋之间所发生历史变化的归纳与提炼,在此传统下再借用内藤假说的概念,其实只是相当于使用了一个话语平台,由此进一步展开唐宋之间历史变迁内在轨迹的探讨。这原本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进路。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用一条长注概括了其对唐宋之际历史重大变革的理解,综述了这个研究进路中学术界已经达成的许多共识。文中指出人们趋近一致的意见是,在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间信仰乃至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确实呈现了许多变化。凡此种种,有些虽有地域差别,但是,在时间上,莫不或前或后参差发轫于唐宋之际。或者说,宋代上述领域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大多可以从唐代中期觅得端绪,验得萌蘖。不仅这样,在这些变化之中,有一些看来已经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后原来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传统之内的变化,而应该是结构性范畴的变革。

当然,这里还涉及唐宋之间的变化起点问题。1986 年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中国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过一次集中讨论,相对于中唐变革说、晚唐五代变革说,南北朝隋唐之际开始发生导致宋代那种社会面貌变化的观点受到重视。

时代定位研究牵动的各重要议题中,士族及士庶区隔问题至为关键。可以说,对士族问题的关注无疑深刻影响着隋唐史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题的展开,无论中文学术界还是日本和欧美学者都探究颇深(日本学界普遍称之为贵族制研究。中文学术界的代表性论著如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范兆飞《权力之源: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分野》,《学术月刊》2014 年第 3 期)。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注重学术史的反思和理论探讨,力图回到士族问题最初被提出时的理论语境,找准问题焦点,以此为出发点揭示新的问题,克服缺少问题意识只是就一些家族进行个案研究的同质性重复现象(参见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 年第 5 期)。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丰厚积累的基础上也围绕着时代定位问题展开。站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历史转型的起点上,重新审视 6—10 世纪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变迁,这个视野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政治制度和文书学研究深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政务运行”研究思路的提出,使得传统的以职官为中心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向了以事类(政务)为中心的综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说制度史成为一种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运行及其变化。随着出土政务文书的不断整理刊布,这个研究取向集中体现在对行政运作、信息流通和政务处理规程的关注。文书、信息与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复杂运行图。要了解帝国的运行,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图景之中,具体认识依托于政务文书的信息流通与权力配置。目前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所依赖的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以及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在解释历史时可能存在着盲区。不是说权力都落实到文书上,许多时候权力体现在文书之外、处于无形之中;与此同时,落实到文书上的权力也不全部都是真实的权力,有

时候只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权力。但是,文书之外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在制度背景上还是以文书规范的流程为潜在依托的。只有了解文书体系中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才能避免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带入权谋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总之,尽管研究角度和问题空间有所变化,但是,对官僚制度、政治体制及其发展变化的关注,仍然是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的落脚点(代表性论著如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013年新版。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法令体系是涉及隋唐五代时代特性的重要领域,法制史研究的成绩相当显著。除了传统的有关唐律研究和围绕“唐令拾遗”展开的持续工作之外,1999年戴建国率先披露了在天一阁发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的情况以后,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一书,其中不仅包括明钞本《天圣令》的影印本、校录本和清本,还附带有该课题组花费巨大心血所完成的《唐令复原研究》。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再次成为唐宋史研究的聚焦点,专门论著可举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一方面,对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天圣令》在传世的编撰史料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架起了会通的津梁。如果仅仅依据“以令式分入六司”编撰而成的《唐六典》来结合零散的出土档案文献,国家政务尤其是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务来说,运行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程式,是无法复原的。而在《天圣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以往较少关注或泛泛而论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细节性有了很大的改观。另一方面,由于《天圣令》同时包含唐、宋两种《令》,透过宋代“不行”的令文,分析其不行用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以及透过宋代行用的令文中如何“以新制参定”而改动唐令中的关键字词,分析这个改动背后的原因,如此深入下去,则唐宋法令之间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变化就能够立体地呈现出来。高明士提出“天圣令学”的概念,并提示以此带动唐宋变革研究的深入(《“天圣令学”与唐宋变革》,《汉学研究》第31卷第1期,2012年)。这个角度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此外,对《天圣令》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礼制史和法制史相关研究成果的刊布,如吴丽娱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和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使成果丰硕的礼制史和法制史研究再上台阶。

制度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是在官制或者官僚制的研究中,接着最近几年翻译成中文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11年新版)和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日本学者著述的思路,在国家行政机构层面之外,注重官僚制度的社会层面。国家行政体系在制度形式上有着整齐划一的设计,真实的国家构造和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机制,却应该是大量吸收了产生于复杂社会运行中的各种要素。近年来,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包括州县官府在内的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官员选任迁转制度及俸禄体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扩大化问题研究、藩镇体制与唐宋间官僚身份体系变化研究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借鉴了这样的研究思路,进而提出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当然,这方面的整合性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成绩,对于隋唐国家构造的特质、路径及其与宋型国家的区别,还缺少全局性的把握。

总之,随着制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效积累,曾经一度受到以关注地方和社会基础为核心任务的“新社会史”冲击而略显沉寂的“国家”议题,最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视,带出了对中国古代传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构建途径和基本特质的探究。其中,在钱穆、严耕望等人强调的汉唐之别及宋承唐而建制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唐型国家与宋型国家存在的实质性差别,宋代国家的构建路径及其来自唐和五代十国的背景和缘起因素,这样两个基本面向上的诸多问题受到了集中的关注。国家形态意义上的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之分,并不意味着唐朝与宋朝的国家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完全断裂而无连贯性,也不意味着唐朝的结束和宋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两种类型国家的终结和确立,二者应是有所延续但在主体特征上又明显区别开来的两个类型。究其主体性和实质性的差别,目前研究所揭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君主(及制度化皇权)在国家政务裁决体系中位置的前移及其带来的君相关系的变化,使职差遣作为一种机制得以自上而下贯彻;地方各层级中心政务的分化,以及随之出现的中心政务之外某些行政权力的下移,县级政务运行的相对独立;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买卖限制的取消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通过基层行政机构对乡村进行户口、赋役和司法控制的强化,等等。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位研究并综合出新的重大论域。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作为学术概念的界定,也还有待具体研究的积累和理论构建的完善。

隋唐五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话题如相权、党争、宦官和藩镇等,从局部视角或具体材料出发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综合性理论性探索正在中外学术的交流碰撞中展现,并显露出广阔的学术前景和研究活力。例如,藩镇研究就是对传统研究推进较为显著的领域,“藩镇体制”和“藩镇时代”概念的再次运用,将这个在个案研究方面非常深入的议题推进到一定的整合性层面(参见刘兴云《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可举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唐宋间统治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相关问题,包括其构建与维护机制的变迁、价值体系与身份界限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等,是近年来在士族门阀研究基础上出现的重要学术论域。其中,围绕科举和铨选而形成的“孤寒”与“子弟”,唐代不同时期政治话语中的“清流”与“浮薄”,唐人概括的“八俊”等快速升迁路径,诸如此类与统治精英集团形成途径和价值认同相关的问题,包括政治身份的获取、仕宦途径和婚姻策略的选择等,在史料解读和论题开掘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版;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政大出版社,2012年;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陆扬尽力协调社会史研究中的“精英”概念和文献中诸如门阀、士族、旧族、新门、孤寒、子弟等概念,回到历史语境包括书写语境,细读各种文本的微妙修辞和写作意趣,提出并界定“清流群体”和“清流文化”两个概念,用以解释唐后期的整体政治史和政治文化。此书关注点不同于传统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对具有确定性的权力的重视,而是更加着力于把握历史进程中那些真切存在有迹可循却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在欧美中国中古史研究传统中,这是一个建立在细读史料基础上颇有推进的研究方面,而其以中文写作和出版,更对中文世界的唐宋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冲击。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带出一个在更长时段如何评估中古时期不同精英集团的问题,包括精英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现实依凭所发生变化的性质和轨迹,是否存在一个从依托门第阀阅构建起来的士族,到崇重当朝冠冕的氏族,再到上述清流群体的历史进程。从唐宋之间的变化来看,统治精英身份认同的价值体系有很大的继承性,但也有所区别。唐代统治精英的人数相对较少,在不同时期获取政治身份的途径也有所变化,但在其获得成功之后,还遵循着魏晋以来编撰谱牒的传统做法,以挤入士族的行列。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整个唐代精英集团的身份认同及其与其他阶层身份的区分,还是魏晋以来清浊之分的继续,尽管区分清浊的标准和依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宋代,“器识”与“浮薄”之分大有取代清浊之分的势头。宋人很大程度上接过了唐末反“清流”势力指斥这个精英集团“浮薄”的话语,将“浮薄”一词指向没有地方历练、缺少器局和吏干的文人。宋人论唐史时所称之“浮薄”,当考虑这一层转换之后的回用,不可径作唐人语汇来理解。或许正是因为精英集团身份区分所依托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政治精英人数的不断增加,宋代以降精英人物获得成功之后,就不再像唐代那样通过编撰谱牒来标榜身份了。正如南宋时赵彦卫所说,“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不复以氏族为事”是一个否定句,从正面说,宋代的文化精英已经不需要通过炫耀家世的谱牒,而是建立起完全依靠科举功名确立其精英身份的价值依凭,精英集团的构建以此为认同基础,并通过

编撰《登科录》《同年录》等来构建精英人士的网络。

民族史尤其是西域民族关系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极为重视的方面。如何认识和描述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特征,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在广大西域地区生活或建立政权的各个民族的族属和文化特征、民族分布和迁徙情况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一项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仅仅依靠两《唐书》的“四夷”列传和《通典》《册府元龟》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对出土资料的发掘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且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依托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和各种胡语文献,研究以西域为历史舞台的各个政权之间政治文化关系;依托碑刻史料尤其是出土墓志(包括少量多语种碑刻),研究入仕唐朝的各国各族人物、家族和族群,以及外来宗教相关文物文献与宗教信仰;依托用汉字写作的入唐僧俗人士的文集、行记和碑刻等域外文献,研究隋唐帝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诸政权的交往。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凡是能够利用的资料,大都已经得到精深的发掘和精审的利用(参见李丹婕《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朱玉麟主编《西域文史》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尽管目前阶段这方面的研究,主体还停留在史料钩沉和资料汇编的阶段,尤其是文物资料中有关外国和周边部族入仕唐朝人物、家族和族群的研究,以及物质交流和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各种成果呈现出斑斓色彩。外来文明对隋唐帝国的实质性影响、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核心特征,这两个方面的整合性研究也已经有了可喜的开始,呈现出建立在精深研究基础的回归叙事取向。例如,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提出,随着内亚游牧民族的政治发育,华夏不再成为他们政治认同和政权建构的唯一选择。由此,唐帝国在北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彻底影响到了唐以后的历史进程。

中外关系史也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得到重大推进的一个显著方面。例如,随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博物馆、罗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出版,一个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家族的丰富信息得以呈现,隋唐丝绸之路的具体情形也在大量中亚风格的遗物中再现。20世纪末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的发掘获得重大发现,以及后来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康业墓、李诞墓等,都使古代中亚包括粟特、罽宾等国的习俗、信仰尤其是祆教的研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代表性论著可举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至于这些北朝后期生活在长安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后裔是否继续留住长安,众多缺少出土信息的西安地区粟特人墓志的主人与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一步。又如,西北大学在2004年征集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

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作为国名最早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对遣唐使的集中关注,并由此出发,重新审视并真成入唐的8世纪上半叶及其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给已经丰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荣新江《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年)。再如,1984年在陕西泾阳县发现的《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碑》记载了贞元年间杨良瑶受命出使黑衣大食(今西亚一带)的事实,加上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唐代时期沉没的阿拉伯商船,引发了对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问题的重新思考。总之,在大量个案史料所揭示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隋唐帝国与东北亚、西域和内陆欧亚、波斯与阿拉伯、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交往面貌更加清晰。一些重点问题如张广达对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碎叶城所在地理位置的考订,区域性综合研究如王小甫对唐朝与吐蕃、大食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隋唐帝国在西域统治的了解及其与西方各国的交往情况;一些具有统摄力的概念如“粟特系祆教”以及独特解读角度如葛承雍所谓“胡人的眼睛”之类的提出,有助于将零散的资料串联理解;一部全新的隋唐帝国对外关系史呼之欲出。了解那个时代的视野,也从依托汉文文献、站在中原立场,扩展到面向欧亚广阔空间、依托各种胡语及外国语文史料及相关考古材料进行全新的解读,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面貌更加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些建立在大量考古资料基础上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艺术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新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最显著的成绩之一。

由于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关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显学,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成果。21世纪以前,这些国际学界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学界并不广为人知,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学术规范的注重、对学术史积累的尊重,在引介外文研究成果的同时,中文学术界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无论佛教、道教还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中国学者或者说中文学术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在20世纪的隋唐史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大凡隋唐时期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赋役管理及财政诸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都有赖于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尽管文献学意义上的敦煌吐鲁番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学术界已经在呼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从文献学向历史学转型。随着文献整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相关资料认识的深化,对于具有档案性质的各种官私文书和写本文献的价值认识更加深刻,对那个时代历史真实形态的认识也不断推进(参见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荣新江《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三、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就评估与学术展望

20 世纪新史学展开后至 60 年代,隋唐史研究耕耘已深,大家辈出,基本议题和叙述框架大致奠定。议题的变化和范式的转移并不如传统议题的深化明显。可以说,隋唐史研究中的基本叙述框架虽未有(亦非必须有)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但一些涉及较长时段和较为宏观视野的历史进程得以“深度描写”,历史叙事更加充实。这个现象体现在众多方面,例如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到宋代官僚制社会的转型,唐宋间政治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型,唐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型等,各个方面历史进程的描写都比以往要深入和细节化,历史转型中的关节点得以呈现。

总体来看,40 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但是,并不说明这个断代的研究取得了在整个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成绩,更不必说超出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影响。尤其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逐渐冷落的趋势。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中有所推进(代表性论著如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刘玉峰《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年),但一直缺少聚焦性的议题,对隋唐时代历史定位整体分析框架的建立还缺少实质性的贡献,许多基本问题还要回到隋唐史研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如陈寅恪、唐长孺、何兹全、宁可等人的论著中去寻找解释(参见张雨《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与中国中古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40 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积累深厚却缺乏全局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隋唐五代时期的新资料不断出土且数量众多,追踪新资料成为紧迫而令人兴奋的任务,综合性的整理消化还需时日。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对这个时段的史学研究,却可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缺少理论形态和方法论关怀的一个断代领域。近 40 年来,除了接续日本学界讨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和唐长孺提出的“唐代的南朝化”以外,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宏观的理论性概念,或者说很少有能够与其他断代研究中运用或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相提并论者,如早期历史研究中的疑古方法和国家形成理论,秦汉史研究中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文化范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族群理论、政治体概念和史料诠释方法,宋史研究中解释“祖宗之法”的政治文化理论与解释“重文轻武”现象的权力结构理论,明清史研究中的贡赋体系与经济史理论、田野调查中运用的社会史理论等,甚至也没有提出与陈寅恪种族文化史观和统治集团理论等量齐观的理论与方法,也没有形成一些可以聚焦的牵动性议题。

这个现象本身即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不仅折射出隋唐五代历史特殊性和史料

留存特点的一些侧面,也反映出这个断代研究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证和问题关怀相结合的基础上,没有在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立之中摇摆。陈寅恪自然不是许多现代史学史研究者所说的史料派,甚至某种意义上更属于理论先行的史论派(参见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只不过其史论不能容纳于20世纪50年代的显学而已。唐长孺和汪钱、王永兴等人在研究路数上都是陈寅恪的继承者。也许正是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辈学者开辟出了许多重要的论域,使人“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辈学者设定议题的路径依赖”(仇鹿鸣语)。加上时代变迁和学术语境的转移,使得后来的学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消化和补充。这种消化和补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议题的范围逐渐细化和缩小的倾向。这应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如同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谷川道雄主编,李凭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的《总论》中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尽管开拓出了许多崭新的题材,各个专题领域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样,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之在中国史的巨大框架中发挥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中国学者中,在1980—1990年间也曾经盛行一种学术观念,即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或式微,而实证研究得出的成果却具有长期的价值和意义。从具体研究结论的接受角度而言,此说确有道理,不过在更长时段和更宏观视野的学术史总结中,人们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那些议题和进路(出发点和具体论题),原本还是在理论论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历史学重视实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理论衰弱的过程中将话题不断细碎化,而是需要新的现实或者理论关注中对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做出省思,进而提出具有一定宏观性的新议题,并以此引导实证研究的方向。即使号称客观的文献学研究,除了校勘之外,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纯粹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可能并不说明或者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什么理论语境中作研究。譬如唐代文献学研究成绩卓著的黄永年,看似从文献出发解析细节,其实还是有陈寅恪的理论作为研究出发点和背景。这大概是需要学术史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核心议题与其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学术史反思,在年青一代学人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呈现出来。随着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原有知识体系和逻辑框架中的学术积累丰厚到相当程度,新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更替不断呈现,单纯依靠新资料做研究的状况开始转变,转而根据问题需要主动发掘整理已有资料引出新的研究取向。例如,总结曾经具有宏大理论关怀又有实证研究的日本东洋史学术理路,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中古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及其留下的学术遗产,就成为当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宋史学界寻找新的出发点的一项集体有意识课题。这种总结并非为了接续日本学界曾经的论争,而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试图超越实证研究的一种努力。

在此背景下,从实证研究走向综合叙事的取向,尤其是以政治史为依托的叙事取向日渐显现。这是一种立足精细研究甚至详密考证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是对政治史的一种回归,或者说是政治史研究的一次再出发(黄宽重、邓小南等人在宋史研究中所提倡)。再出发的政治史,不是学界在新旧世纪之交总结的那种包括政治人物、政治斗争、政治事件以及政治集团与派别等单一政治现象的研究,而是对政治权力及以之为中心各种事象解释的立体视角,或者说是各种视角历史叙事对政治史的依托。无论是制度史(制度史本身是一个综合研究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官制史、财政史、礼制史等单一视角)、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各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只要进行历史叙事,其所能依托的框架就必然是政治史。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史料特点决定了政治史的主体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个层面。

学术交流与对话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要途径。当今资讯发达检索便捷的情况下,开展与外国同行的对话与交流更加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充分不及时,暴露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西方学者之间交流中存在的隔膜,既有关注重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文学术传播途径不畅造成的。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史料并不像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方面一样需要“出口转内销”,中国读者并不指望从西方学者研究古代史的著述中获得稀见的史料。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不以史料丰富或运用罕见史料见长,而是通过史料的特殊排列方式呈现出特有的见识。这里面有一些只是站在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历史时所特有的眼光。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一些高度综述了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概览性著作,如《剑桥中国隋唐史》(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或许就是了解其学术脉络的良好桥梁和纽带。

综括言之,国内隋唐五代史学界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有了日渐客观的认识,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时实际上增强了自信。随着年轻学人的成长,发挥所长,补足短板,几代学者期待的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以及在整体中国历史进程解释中贡献率的实质性增长,都将是屈指可待的。

(责任编辑:张欣)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 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 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

不过, 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 40 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 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 国人对公元 10 至 13 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 产生了近乎逆转性的变化。

一、时代背景

任何学术研究的推进, 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 历史学尤其是如此。因为史家观察历史, 于技术、资料等外部条件之外, 在思想认识与分析方法等许多方面, 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的影响与制约。虽然史学研究的对象恒定不变, 但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归纳而言, 40 年来, 影响辽宋夏金史领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大致可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学术领域的思想禁锢逐步被打破, 引领学者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传统的经典理论虽然一直被学界所尊奉, 不过主要出于对理论教条主义弊病的警惕, 尤其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 其实际影响力无疑减弱了。改革开放之后, 在海外学界的影响之下, 一些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渗透日深, 其中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范式与分析方法, 最受本领域学者们的关注。表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 除了对一些历史现象解释与性质判定产生差异外, 最明显的是研究议题的移易。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受到关注, 传统的、根据经典理论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议题, 明显受到冷落。

(二) 学术思想的弃旧扬新, 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员的更替换代表现出来的。40 年来, 在本领域大致有四个代次的学者先后登临学术舞台。第一代是成熟于 1949 年之前、复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 在本阶段前期, 他们引领了学术研究的走向, 辽宋夏金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同时, 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年学者, 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 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 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 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他们是第二代学者, 大致到 90 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代学者则以七七、七八级学生为主, 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 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 在 90 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 成为学界的生力军。进入 21 世纪后, 更进一步成为本领域学术研究的主导者。紧接着, 第三代学者薪火传人, 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助力下, 每年又训练出来相当数量的辽宋夏金史方向研究生。10 余年来, 学界在各方面都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大批学术“新人类”——第四代学者——的影响。

在讨论议题与研究方法方面, 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 以及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学者代际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前期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学术观念与讨论议题仍占主导地位, 例如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 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 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 早先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 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 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 土地制度, 租佃关系, 农民战争, 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 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 等等。辽夏金史等领域与此类似, 例如一如既往地强调作为它们奴隶制国家的性质,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议题。从第二代学者开始, 议题与方法已经出现某些弃旧扬新的态势, 及至第三代学者进入主导地位, 新旧之间的更替则成定势。第四代学者基本上是追随其师长的学术路径, 而有所拓展。

总体看, 本领域前后之间的学术面貌有较大改观。一些旧议题逐渐被以社会史、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近年来有学者综述本领域的研究状况, 屡屡提及作为传统研究议题之基础的经济史研究“不容乐观, 至少在成果数量上持续走低, 后备的研究力量明显不足”(梁建国《2011 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 年第 6 期); 或者经济史中“有新见的论文不多, 重复、细碎性研究日趋严重”(李华瑞《2014 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 年第 1 期)。同时, 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民族关系、思想流派等议题, 开始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核心概念与分析取向也有不少调整。例如, 年轻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精英”这样相对正面的概念, 来取代此前“地主豪强”“猾吏劣绅”之类明显具有

贬责意味的用语，以指称地方社会中的权势人物；对于文献中所见之“盗”“寇”“贼”“匪”之类记载，此前大多不加分辨地归为“农民起义”，新近的论著则往往更为审慎地以“民变”一词来作指称。又如讨论历史人物，也更多地将研究目的从此前的“肯定”或“否定”等功过评判与道德审视，调整为对于其多重历史影响的具体分析。

（三）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宋朝——历史的看法。

长期以来，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说的理论框架的界定，10至13世纪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末端或后期开端，被认为已经走下发展高峰，开始进入衰退期。可是在现实社会经济刺激之下，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以及国际学界出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目的，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帝制后期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使得中青年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尤其是，正如有学者早已研究证明，差不多已经成为国人共识的、关于宋代国势积贫积弱的看法，是近代学人鉴于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反观历史，出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以及对赵宋王朝国势不振之史的自惕，在强烈的民族情感背景之下归纳出来的。近年来国力的增强，使得学者们慢慢摆脱那种情绪化的心境，得以相对平静、全面地来观察两宋历史，以充分认识它在经济、文化、学术、技术等许多方面空前的成就。

支持宋朝国力积贫积弱看法的一个关键“史实”，是它的武功不振，对外妥协，依靠向周边民族政权交纳岁币来维持边境的和平。近年来，不少论点有明显调整。例如关于北宋向辽国交纳岁币问题，就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澶渊之盟的历史影响，如宋朝从宋辽双方榷场贸易中赢得了超过岁币的商贸收入，中原、契丹人民从此得以和平相处等，来否定此前的一些看法。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国人对南宋历史看法的转变。如果说“积贫积弱”是国人对于宋朝的一般性看法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南宋历史的看法则更为不堪。长期以来加给南宋的标志性指称“偏安小朝廷”，就是一个完全贬义的概念。进入21世纪以后，南宋历史的这种负面形象发生了令人称奇的变化，地方政府开始将其视为难得的文化资源，设立机构，投入巨资，来推动南宋历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南宋历史的意义，强调“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四）支撑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明显改善，这里主要指可能直接影响学者研究条件的资料提供与数码技术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起飞,出版行业也开始快速发展,大量古籍被影印或经整理出版,为学者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研究条件。由于从宋代起存世古籍成倍增加,其中多为孤本善本,各地馆藏情况不一,所以它们对于宋元以下各断代的研究来说,实比隋唐以前各个断代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作为研究宋史最主要史籍之一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直至它在 1986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各地学者才得以比较方便地应用。古籍影印与整理工作的推进,使得一些原本相当稀见的古籍成了学者们案头的常备书,京沪之外的各地研究人员才逐步在基本资料方面具备了相对方便的条件。同时,因为各地大兴土木,作为它的“副产品”,本阶段所发现的辽宋夏金时期地下历史文物相当丰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城市考古领域为突出。另外,一些重要历史资料从域外的引进出版,例如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等对相关领域的促进作用,可为显例。这一切,若非社会经济明显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例如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等等。福祸相依,新技术的应用难免带来了一些反作用,但综合起来看,尤其近一二十年以来,学科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感受到了它的推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新技术使得研究者搜寻资料更为方便,数十百倍地扩大了他们搜寻资料的数量与广度,也帮助了年轻学者得以迅速进入具体专题的学术场景。一些相当冷僻的文献,现在频繁地在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出现。如果应用得法,必然对研究带来相当正面的影响。例如学者得以依据更多、更为全面的论据来对史事进行归纳分析。一些原本比较不容易讨论的议题,也有可能变得相对轻松。近年来涉及统计分析的议题,如某一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等明显增多,可为明证。某些历史现象最早见诸记载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容易确定了。

时代背景对于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研究者基本的生活条件如何,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国家政治、就业市场、学术管理机制、现实生活中各种“后现代”观念的流行,等等,更不容忽视。不过相对而言,前面所述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它们对本领域研究的影响当然不是一直平铺展开,而是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的。

二、概况归纳

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之下,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发展增长差不多是全方位的,经过一番概览式的梳理,就可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 关于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40 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增长

了数倍,这是本领域学术增长的一个明证,也是它的基础。由于研究者的学术领域常有跨界,人数的精确统计并不可能。不过如果以宋史领域的例证看,参加1980年首届年会者60余人,目前注册的学会会员近500人,其中经常参加学会学术活动的近400人,数十年间增长了6倍有余。辽夏金史领域的情况不会完全平衡,不过当与此约略相近。

辽宋夏金各个专史都成立了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明显推进了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各断代史领域中,宋史首先于198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组建理事会,指导会员们的研究工作。作为本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会按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召开学术年会,并编辑出版年会论文集。自1980年至今,已召开了17次大规模的学术年会,出版了17册《宋史研究论文集》。辽夏金史领域与此相似,1982年6月成立中国辽金史学会,定期组织召开学术年会。2003年,转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从1987年出版《辽金史论集》以来,至2016年,已出版了14辑。西夏史则基本是通过中国民族史学会展开学术活动。本领域主要的学术出版物,有李范文自2005年起主编出版的《西夏研究》,前后共计出版了8辑,自2010年起改为由宁夏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此外,各地还成立有一些地域性的学术组织,例如于1984年成立的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迄今已经30余年,会员从40来人扩展到300余人,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在宋史领域,也成立有岭南宋史研究会等。

40年来本领域也成立了不少重要的专史研究机构,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由教育部设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几个研究机构。其中有最初由教育部批准、成立于1982年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辽宋夏金史研究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年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列,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2000年成立的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2009年改名为西夏学研究院)和河北大学2001年成立的宋史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单位也成立有与本领域相关的学术机构,重要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院、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等等。

这些研究机构大都编辑出版有相应的学术专刊,重要的如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自1990年起编《宋史研究论丛》,迄今已经出版了20辑;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院)于2006年起编《西夏学》,迄今已经出版了13辑;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组织学者撰写“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67种。

(二) 论著的数量增长惊人。40年来,总共刊布了多少关于辽宋夏金史研究的论著,无法统计,也不一定有意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数量惊人,逐年增长,近年尤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推进的事实,更印证了数量化的研究人员考核制度之推波助澜作用。

比较具有指示意义的现象是近一二十年来各领域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的增长。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统计,以“宋代”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999 年仅 2 篇,2000 年 10 篇,此后持续增长,到 2007 年超过百篇,此后一直持续在八九十篇左右,直至 2015 年后才略有下降。这里当然也反映了高校扩招政策的直接影响。辽夏金史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长与之相似,2000 年仅 2 篇,后来持续增长,到 2011 年已超过了 20 篇。

数量当然绝非等于质量,不过由此展示出学术大跃进的态势则十分明晰。

(三) 断代史专著陆续问世,相关专题研究全面铺开。通史式的全面铺叙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是观察史事的两种有效方式。这两种方式相互之间又是密切联系的,前者须以后者一定程度的积累为基础,一部编纂得当的断代史往往是某一时期相关领域综合水平的指示器。40 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断代史的陆续问世,比较直观地展示了学术推进的过程。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辽宋夏金各个领域都陆续出版了几部断代史专著。1979 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 6 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三章分别叙述辽、西夏、金三朝历史。这既是通史著作中最早以较多篇幅为辽、金各自单独设立专章来作完整叙述的,更是第一次将西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为之设立一个单独章节的。同年,张正明《契丹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也是在同一年,钟侃等出版了第一部西夏史《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次年,吴天墀《西夏史稿》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积作者数十年之功,所搜集的汉文史料相当丰富,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深得学术界好评。1984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博泉《金史简编》和杨树森《辽史简编》等。

宋史方面,第一部断代史直至 1985 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由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此书关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以及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的结构安排,可以说是当时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一个归纳总结。在南宋史方面,则差不多在 30 年后,由何忠礼等编写了八卷本《南宋全史》,2016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在邓广铭先生关于打通辽宋夏金、构建“大宋史”理念的影响下,学者们试图重新搭建历史的架构,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叙述 10 至 13 世纪的历史,于是出现了通论辽宋夏金史的努力。1986 年,杨树森、穆鸿利等编著出版了《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到 2010 年,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由漆侠主编、380 万字的宏篇巨著《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集中反映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在辽宋夏金史的各个专题领域,相关研究论著的数量则不可胜数。可以说,举凡

存世资料相对充沛、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了学者撰写了专书，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专文了。一些热门的议题，例如核心的国家制度、重要的历史人物、著名的文艺作品、主要的思想流派等，专书专文更是集中，其中免不了就有相当比例的重复现象。

一个比较具有指示意义的现象就是，一些范围较小或相对冷僻的议题，也开始有学者为之撰写研究综述，分析其学术史的展开与研究现状，由此可以证明在那些领域都已经有了不少的学术积累。例如南宋的《平江图》，虽然是研究当时城市史的重要资料，但议题空间毕竟有限。但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16篇专题讨论《平江图》的论文问世，以至许文刚得以为之撰写专题的学术综述（许文刚《〈平江图〉研究综述》，《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5期）。又如“买扑”是宋代官府市场经营（征榷、和买等）中的一个制度环节，自从1984年裴汝诚、许沛藻发表第一篇专文《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辑）以来，至今已刊布有20多篇专文，更有专书一种，对它展开讨论。杨永兵还撰有研究综述一篇，归纳了这一议题的学术史（《近30年来宋代买扑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0期）。议题相对冷僻的，例如合灿温综述近30年高丽遣使金朝问题的讨论，征引研究文献49种（《近三十年来国内高丽遣使金朝研究述评》，《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郑玲分析河西回鹘与西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列出相关研究文献32种（《河西回鹘与西夏关系研究综述》，《西夏研究》2016年第2期）。又武婷婷归纳关于辽、宋、夏、金婚礼服及其礼俗内涵的研究，列出的今人所撰参考文献达70种（《辽、宋、夏、金婚礼服及其礼俗内涵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3期）。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三、研究举例

在议题全面铺开、论著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40年来我们对辽宋夏金史的认识也大大地深化了，尽管深化的程度未能与数量增长成正比。

总体观察起来，学术范式的推陈出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新议题的提出，多领域、多学科融合研究之受重视与一些视野更为宽广的核心概念（例如“宋学”“大宋史”等）的推出，考古资料、文书档案等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研究，制度史等重要史事研究的精深化等等，这些研究深化的具体表现，尽管不一定绝对平衡，却无疑是辽宋夏金各个专史领域的共同现象。内容相当丰富，下文在不同领域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研究范式的推陈出新，是本阶段最令人瞩目的学术进展之一。在坚持尊奉经典理

论的同时,学界借引了不少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学术范式,其中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这使得研究者得以从更宽广的视野,用更多元的分析方法,来讨论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而进一步展示历史的复杂面相。

例如在宋代思想史领域,学术史上存在着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为分野,给具体的思想与人物贴标签、划线站队的现象,将“学统四起”、精彩纷呈的宋代思想史领域,描写成了失真而又乏味的两条路线斗争战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种现象大为减少了。相反,深入历史文献内部、深入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话语体系、深入人物主观世界的立体研究大大丰富起来。此前,很多人物和流派被认为是缺乏研究价值的,在历史上起到了开倒车的负面效应,譬如理学派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及其学派,客观的研究很少,仅有者也主要基于批判的立场。40年来,情况被根本扭转,对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的研究禁区不但无形消散,而且在生平研究、思想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此外,关于李觏、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的研究也得到了大大的深化。40年来研究者在面对思想史文献时不但重视思想者在文献中主观上“说了什么”,也重视他的主观思想表述是否被他人、被社会所接受,是否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客观考察思想观点的历史后果,因此也使得我们对宋代思想史的理解更加贴近历史实际了。

尽管如前所述,本阶段经济史受关注的程度减轻,其在整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但它同时又是学界借引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学术范式的努力比较明显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不少研究成果在深度上有许多推进。例如关于宋代的土地制度、租佃制与地租形态等问题,传统的观察大多强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从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租佃关系中人身依附减轻与否、地租形态之从劳役转向实物,租佃契约的内容与性质等,来展开讨论。近一二十年来,这些议题明显受到经济学等学术范式的影响,效益、产权、风险控制与交易成本等等核心概念与分析方法开始在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就如从两宋时期开始,土地关系日趋复杂,土地出售中的以典就卖、租佃关系中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等现象开始出现,新近的研究在关注到这些现象可能影响到社会阶级关系的同时,更多地将分析的立足点落在了产权关系方面。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官田佃户的永佃权事实上已经形成。民田方面,佃农则已经拥有稳固的租佃权,永佃权尚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只在局部地区出现。土地产权这种多元化的发育成长,对于进一步激发产权权能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积极意义,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宋代土地买卖中存在着的典卖现象,学者们在深入梳理产权多元化趋势,强调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的新格局的同时,还注意到国家赋税和户口登记制度视田产的出典为财产转移,并不将出典田地作为财产来登记。在国家管理制度中实行的这种“一元制”产权形态,与流通领域存在的“一田两主制”形态不同,它是国家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出

发,行使财税和行政管理职能的结果(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龙登高《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实际上,差不多在辽宋夏金史的所有领域,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学术范式转换的影响。例如政治文化分析工具之被应用于关于“祖宗之法”这样的观念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在辽宋夏金各政权关系的讨论中跳出传统的华夷分野与中原正统观念,以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外交”)与分析工具着手讨论,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为疏于分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甚至将现代社会生活中流行的一些概念,直接应用到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分析之中,例如外向型经济、市场化、人才培养之类;或者模仿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揣摸历史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等等。

似此学术推进有不少也许并非跨越式的,不可能全面重构学术史,有些范式调整与新概念、新分析方法的引入,更可能尚显生硬,不过其所代表的学术发展方向令人鼓舞。

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新议题的提出,则无疑是重塑本领域学术史概貌最重要的推动力。尤其对于第三四代次的学人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主要根据经典理论提出的那些议题,不再具有往日的主导地位;随着国门开放,西方史学流派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进来,恰好回应了他们的需求。于是,议题重心之从传统的国家政治与阶级结构,转向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地方社会、精英阶层、婚姻家庭、社会性别、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民间信仰、疾疫灾害、理念认同等方面的议题,慢慢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一些专史领域,例如历史地理学,也开始讨论起历史上的环境与生态等问题。

有的时候,研究议题的更替并不一定以“新”覆盖“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的引领之下,不少“旧”领域得到了有意义的拓展。例如作为传统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仪制度,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仅从近年来本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看,明堂、朝会、祭祀、丧葬、乐制、服制,乃至礼器等,都被纳入了讨论的范围。

这也说明,历史研究的对象恒定不变,尤其是对于像辽宋夏金这样文明比较发达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凸显的社会现象,从来都是人们关心与研究的重点。10至13世纪的一些突显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等,是任何时期的观察者都不能忽视,必须予以悉心分析的。议题虽旧,其命常新。于是在这里,视角的“高下”有时就要比议题的“新旧”更为重要了,端看研究者能否透过表象观察到历史的真相而已。正因为此,有学者就开始关心如何从旧议题中发现新意义。邓小

南就明确提出了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的口号（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近年来不少学者展开了对国家管理中信息流通渠道的研究，成绩斐然；包伟民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也是旧题新作的显著实例（《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

正如礼制与信息渠道等议题所展示的，前者主要涉及国家制度与文化思想两个不同的领域，后者虽然以国家管理制度为主要讨论对象，与传统的观察有所不同的是它更强调各个部门、各种层级之间的联系。如果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来归纳，可以发现 40 年来多领域、多学科融合，是推动辽宋夏金史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其中一些通贯性大概念的提出，与民族语言学研究对辽夏金史等领域的重要意义，都为明证。

邓广铭在为 1982 年年会编刊撰写前言时，就曾明确提出，后来并一再强调，应该视辽、宋、夏、金各王朝史为一个整体展来开研究，打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现状；并且特别指出，应该按各王朝建立的时间顺序，将“宋辽金夏”调整为“辽宋夏金”。这就是他的“大宋史”理念，旨在强调当时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揭示在这种联系与影响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十年来，这个“大宋史”理念已经对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推动了诸如《辽宋夏金代通史》那样的宏篇巨著，或者许多专门研究各个政权相互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例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更重要的是，多数研究者在讨论辽宋夏金各王朝的具体专题时，它已经自然地成为一种内在的观察视角。此外，在两宋思想史领域，邓广铭对传统学术史上以“理学”来涵括所有思想流派的做法展开自我批评，提出了“宋学”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40 年来，“宋学”逐渐成为两宋思想史的标志，凸显了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邓广铭《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原作为“前言”，登在 1984 年第三届年会编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关于辽夏金等王朝，早期研究一向主要依靠汉文资料展开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自 19 世纪以来，随着各民族语言的资料相继被发现，对契丹、女真与西夏语的研究也随之开始。由于资料情况不同，各自的推进水平有前后差异，不过 40 年来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辽夏金史领域学术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清格尔泰、刘凤翥等民族语文学者以汉语借词为突破口，并利用汉文文献所记契丹语词，解读契丹小字获得成功，其研究报告《契丹小字研究》于 198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著作。此后，民族语文学者利用这一成果，并结合蒙古语、达斡尔语等契丹语的亲属语

言,对一批新出契丹小字资料加以研究,成效显著,同时对于契丹大字的研究也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国内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先后有几部重要的研究著作问世(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大大推进了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还有几部重要的工具书被编纂出来(例如金启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极大地便利了学者们对民族语言资料的应用。与此同时,利用民族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其真正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充分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给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重要成果迭出。刘浦江关于阻卜与鞑靼、契丹父子连名制等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辑;《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第1辑,2011年)。

40年来,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成就体现在古籍整理、出土文物、历史文书等新发现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

由于学术发展本身的推动与国家制度的保障,4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成绩巨大,在辽宋夏金史领域范围内,大量善本孤本被影印出版,传世四部书之中除经部被整理者相对较少外,其他三部中的主要史籍差不多已经全被校勘出版。本领域卷帙最大的史书《宋会要辑稿》已经出版有一种点校本,新的编辑点校工作正在全力推进。近年来整理工作已经转向一些相对次要的史籍。新的大型史籍图书的编纂也成绩斐然,《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全辽文》《全辽金文》等已经出版,计划达10编、102册的《全宋笔记》已经出版了8编,剩下2编也接近完成。

新资料是史学工作永远的追求。在辽宋夏金史领域,它们大致上可以分为非文字类的出土文物与新发现的历史文书两个方面。在存世文献相对丰富的宋史领域,除城市、建筑、物质生活等议题外,出土文物在多数情况下起着作为文献资料佐证的作用。2012年被整理出版的南宋官员徐谓礼的告身印纸等文书(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是宋史领域首次出土的重要历史文书。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传世以及新出土的碑铭资料与书背文书等的整理利用,对某些具体专题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新资料对学者探索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是在传世文献相对匮乏的辽夏金史领域,尤以西夏史研究为典型。

20世纪初,数量惊人的多数为西夏文、少量为汉文等文字的西夏文书在黑水城遗址中被发现,这使得西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过在20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前,由于黑水城文书主要被收藏在海外,国内学者仍不得不主要利用传世的汉文资料,辅以极少量海外公布以及国内发现的西夏文资料来做研究。40 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除传世汉文等资料被进一步整理、利用外(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一方面,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李范文所编 150 万字的《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可为其代表。一些基础性的西夏文献被译成汉文出版,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同时,以西夏王陵为中心的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为西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文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域外黑水城文书的陆续被整理出版。主要是经中俄双方合作整理研究、从 1996 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迄今已经出版了 26 卷,计划共出版 32 卷。此外,还有国内及其他国家所收藏的不少西夏文文献也被整理出版(例如有史金波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谢玉杰等编《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塔拉等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武宇林等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华书局,2011 年,等等)。西夏史研究的全面铺开,就有了充实的基础。在此之后研究论著的数量快速增长,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充分证明了新资料对学术研究有直接的推进作用。例如主要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关于西夏法律制度及其与中原汉族法系关系的讨论得以深入展开(参见孙效武《近二十年来〈天盛律令〉研究综述》,《西夏研究》2016 年第 4 期)。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两位学者综合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解决了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历史上早期传播的关键问题(《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同时,利用黑水城文书中汉文字资料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参见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 年)。迄今,关于西夏王朝的研究已经在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全面展开,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西夏学。为了全面总结西夏学研究的成就,据报道,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正在推进由杜建录领衔主编、400 万字的《西夏通志》的宏大项目。

最后,在上述各种因素影响下,许多重要史事研究趋向精深化,可以说是辽宋夏金史领域的普遍现象,无论在经济生活、思想流派、宗教信仰、人物群体、民族关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区域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尤以关于国家制度的部分,表现最为突出。其代表著作就难以枚举了。一个显眼的结果就是,在宋史领域,随着社会进步的史实不断得到论证,在时代背景的推波助澜之下,人们对宋代的认识,终于从“积贫积弱”这样负面的贬斥,转向了正面的推崇。前贤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看法,

终于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上大量的所谓“宋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1980年，邓广铭在为宋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曾指出“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研究是较为落后的……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邓广铭在40年前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在“大宋史”范围内的辽、西夏、金等王朝历史研究的领域，也是如此。尽管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固步自封。

四、推进展望

有意思的是，研究进步带来的更多却是临深履薄之感。归纳40年持续扩张的辽宋夏金研究学术史，可以发现它的另一个结果，是带给了这一领域学者们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那就是本领域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论著数量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量。

这种焦虑有几方面的具体表现。

1. 研究方法的缺失感。自从新中国史学形成以来，老一辈学者大多强调学习经典理论的重要性。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最为娴熟的以文献考据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新型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工作要求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样的呼声虽从未中断，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年轻学者们更多地转向了当代社会科学以寻求帮助。但实际的研究工作提醒他们，某些新颖的概念与时髦的方法，也并不总是那样令人满意。于是，追求“有用”的理论方法，就成了本领域不同代次学者的共同特征。本人此前曾称这种现象为“理论饥渴症”。

2. 对时代定位的困惑。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辽宋夏金时期大致位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新一代学者对经典理论日渐疏离，可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于那一个时代框架性的新认识体系则未能产生，以至许多研究者在处理具体的历史议题时，常常有难以把握其时代定位的困惑。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东洋史学界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说曾大行其道，并出现了明显的泛化现象，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困惑的一种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侧面，来综合归纳其时代特征，例如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这些极富勇气与雄心的尝试，值得赞赏。我们期待这些论点的进一步周全与成熟。

3. 平面推进与议题枯竭的矛盾。无庸讳言, 40 年来, 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成果, 仍占出版物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 这样的方式自然会碰到存世历史资料不足的瓶颈。新议题难以发掘, 旧议题则大多已经有了许多学术积累的困境, 就现实地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简单重复遂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在学术评价机制存在各种不足的现实面前, 泥沙俱下、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遂不可避免。

4. 作为双刃剑的新技术。以全文检索数据库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的应用, 在给本领域研究以巨大方便与推动的同时, 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习惯与分析能力。长于通过检索工具来搜集历史资料的表面信息, 拙于经过深入阅读来发现隐藏于历史文本背后的历史真实, 这种情况已非罕见。被调侃为“检索体”的那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正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 虽然不能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本研究领域的不足, 但均属倾向性现象, 可以肯定。今后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推进, 必然在这几个方面形成焦点, 也是可以预期的。

数年前, 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归纳数十年来本领域学术进步的主要表现, 认为所谓进步, 既不在于有哪些旧貌换新颜般的弃旧扬新, 也不一定指许多令人惊异的创见, 而是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思考研究方法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 从更为综合的视域与更加多样化的取向, 以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 是改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这正是学术史所给予我们的启迪。今天, 笔者仍坚持此说。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杜建录、程妮娜、余蔚、王宇、邱靖嘉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志谢!

(责任编辑: 李成燕)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元史研究

刘 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序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元史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的元史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这一时期，以传统修史方法进行的元史研究已接近尾声。真正意义上近代实证史学路径元史研究的开拓者，主要为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三位。继他们而起的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则是以元史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除在国内新式大学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外，还曾到海外不少国家留学，先后师从当时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师伯希和 (Paul Pelliot)，受到很好的语言教育与方法训练，掌握了波斯语等元史研究必备的语言工具。在治学方面，三人都注意面向世界，善于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因熟悉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注重将汉文文献与其他文字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开展名物制度的考证，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元史学者，大都与三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渊源，因此上述三位学者，可看作是当代中国元史学科的实际奠基者。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由近代实证史学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新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史学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思想改造。总起来看，受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1949 年至 1965 年元史研究的队伍规模还很小，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蒙古社会性质与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几个与“史学五朵金花”有关的方面。“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基本上已处于停顿状态，即使“文革”结束后的头几年，极“左”思潮的惯性影响也依然存在。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术思想得到了真正解放，中国的元史研究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蓬勃发展的崭新时代。

二、新风：40 年来的中国元史研究概况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来，中国的元史研究焕然一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

面。这一时期,元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是全方位的。概而论之,可以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后继人才和教研基地的形成。这 40 年的前半期,除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老一辈学者外,一批中年学者已成为元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批学者除蔡美彪外,集中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有亦邻真、周良霄、周清澍、丁国范、陈得芝、杨讷、黄时鉴、余大钧、邱树森、陈高华等。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先后承担起培养元史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为元史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目前活跃在元史研究领域的第三、第四代学者,绝大多数毕业于上述院校。近年来除上述元史“传统重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随着元史人才的不断培养和走向工作岗位,元史的教研基地有不断扩大的良好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便是其中的代表。

(二) 学术团体和学术专刊的建立和运行。元史研究队伍的扩大,为学术团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80 年 10 月,中国元史研究会于南京大学成立,由韩儒林任首届会长,并创办会刊《元史论丛》(目前已出 14 辑)与《元史研究通讯》。此外,专门刊载元史研究论文的刊物,还有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办《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原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8—1990 年共出 13 辑,2000 年复刊后,改名《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共出 4 辑,2006 年第 18 辑起改今名,目前累计已出 31 辑),近年又出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清华元史》(目前已出 3 辑)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主办《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目前已出 3 辑)。

(三) 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元史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研究广度,同以前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自 1978 年起,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均在百篇以上(头 10 年有的年份未到此数,以后则远超此数),近 10 年,更上升至年均三四百篇的规模。与此同时,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横向而言,已广泛涉及政治(包括政治事件、制度、人物等)、经济(包括人口、农业、手工业、赋役、商业等)、法律、文化(包括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社会、民族与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从纵向来看,过去研究重两头(蒙古国和元末农民战争)、轻中间的趋势已得到彻底扭转。与之相应的是研究角度的变化。在元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特别重视元代社会中蒙古及其他非汉族的文化成分,而对汉族文化的固有成分有所忽略。现在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元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努力分析各种文化成分的主次地位,它们之间的碰撞、影响与融合。将元代纳入中国历史长河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也成为近年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

(四) 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化。元史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以日渐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元史研究的对外学术交流也随之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国内元史国际会议的举办和学者的对外交流状况从无到有,日趋频繁。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里,元史研究的对外交流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目前国内元史会议常有国外学者参加,国内元史学者也不断赴外交流,属于新生力量的元史研究生群体也有很多人获得机会去美国、德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进行访问学习,一些人直接攻读学位。不仅交流次数日益频繁,交流合作的程度也日益深化。目前中国元史研究已不满足于及时反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旧有程度,而是不断向真正意义的“国际合作”迈进。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西方最一线元史及有关学科的学术会议、研修班等活动,多能看到中国学者使用英文报告授课和直接同西方同行交流的身影;另一方面,中国元史学者也开始与国外学者合作编写英文研究论著,而非停留在以前译介国外论著的层面。

三、例举:40年来的中国元史研究成果选介

40年来,元史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几乎遍布我们现在所知的元史领域的各个方面。限于篇幅,以下仅介绍一些专题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 政治与经济。政治方面的论著最多,内容广泛涉及典章制度、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军事史、农民战争等各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的综论性著作主要为《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陈高华、史卫民撰稿,人民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其他较重要的著作有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后经修改增订,改名《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与论文集《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政治人物以成吉思汗的传记种类最多,其中篇幅较大者主要有余大钧、朱耀廷的著作(《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忽必烈的传记较重要者有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他政治人物传记则有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邱树森《妥欢贴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后经增补修订,改名《妥欢贴睦尔评传》,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等。军事史方面,则有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四卷《元代军事史》(史卫民撰稿,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内容涉及元代军事制度、战争、军事人物与思想等诸多问题,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元代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赋役制度、手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方面。综合性专著有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高华对元代经济问题潜心研究多年,发表过系列重要论文,绝大多数收入其论文集《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与《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他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体例严整,内容翔实,是元代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元代城市研究主要有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陈高华和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交通方面主要有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贸易方面的研究则有陈高华和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二) 思想文化宗教社会。讨论元代理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三编《元代理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文化史方面综合性论著主要有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史学史研究,主要有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对《元史》的史料来源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宗教史研究,主要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6年修订本)、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年)、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齐鲁书社,2010年)、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中华书局,2015年)等。社会风俗方面则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005年再版)、陈高华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

(三) 元代少数民族历史地理和中外关系。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通史·元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对元代民族状况作了整体性研究。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收录了作者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是中国学界关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谢咏梅《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也是颇有分量的专著。民族边疆地区研究有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周芳《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薛磊《元代东北统治

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

马可·波罗及其行记,一直是元史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版了不少译本。因此马可·波罗研究也是元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重要议题。杨志玖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他针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收入论文集《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他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论著也有不少。此外,还有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三联书店,2013年)、《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

(四) 史料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40年来元史学者对元代史料的整理校勘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诞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按照元史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料整理成果又可分为汉文史料、民族史籍和域外史料几个方面。

汉文史料整理方面,1978年以前只有《元史》的点校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部分的编纂堪称重要。改革开放后,学界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力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较重要的元人别集大都有了整理本,有些别集的整理本还不止一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李修生主持编纂的《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61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镰主持编纂的《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年)68册,是规模庞大的元代文献总汇,也是目前元代文献整理最重要的成果。《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早期历史的最基本史料,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2012年)则是近年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元典章》为元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向以难读著称,经陈高华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出版点校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黄时鉴主持的《元代史料丛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种,汇集以政书为主的元代基本文献。宗教史料方面,陈智超、曾庆瑛在陈垣旧作基础上增补完成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有相当多内容也属元代。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前者基础上又有所增补。

元代的出土文书主要指黑水城文书,而这方面近年来成绩斐然,相继出版了图版、文字更为清晰全面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塔拉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塔拉等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杜建录,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至于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也有不少整理著作出版,如孙继民等编著《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

民族史籍的整理。民族史籍的整理、研究与翻译,是元代文献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前述,《蒙古秘史》在蒙古早期历史资料上地位最为重要,但仅有汉字标音本传世。恢复《秘史》的本来面目,是各国蒙古学家追求的目标。1987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族学者亦邻真《秘史》的畏兀儿字复原本,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零散的蒙古语文献整理与研究,则有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I研究文集,1990年;II文献汇集,1991年)、呼格吉勒图与萨如拉《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元代藏文文献也很丰富,其中蕴含了大量珍贵历史史料,目前一些重要的藏文史籍已先后译成汉文。

域外史料的翻译整理。早在19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学者就已认识到域外史料特别是波斯文史籍对于元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多只能通过《元史译文证补》和《多桑蒙古史》等书去间接了解“域外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得到根本改善。“域外史料”汉译本得以陆续与中国学者见面。其中较重要的有何高济从英译本转译的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余大钧、周建奇从俄文本转译的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周良霄译注的刺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3世纪上半期欧洲教会使节出使蒙古的行记,已出两种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

四、前瞻:对未来中国元史研究推进的展望

综上所述,40年来中国的元史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欣欣向荣的表象下,也掩盖着诸多不足。像不少文章仅靠一些常见的零碎资料东拼西凑而成,停留在浅层次的平铺直叙,根本谈不上是严格的学术研究。有的文章虽然花了不少精力,但因闭门造车,没有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重复别人已讨论过的东西,没有多少新意。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章,其中又有不少因不重视学术规范,使读者无法知道哪些是作者的新意,哪些是前人的观点。另外,研究文本缺乏规范化的通病,也在实际上大量存在着。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元史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大力加强。

第一是史料的继续发掘与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如无史料作后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往的实践业已证明,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往往与新史料的发掘有很大关系。

在汉文、蒙文、藏文史料利用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世纪中国元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种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元史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引人注目的新史料,如在河南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

善集》，在韩国发现的元刊《老乞大》《至正条格》、高昌偃氏家族的《庆州偃氏诸贤宝记》与《近思斋遗稿》，国内外所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公文纸本文书（又作公文纸背文书）的发掘与整理等。这些鲜活的文献资料，有的已被学者引入研究领域，为元史研究增添了勃勃生机。其实，除这些新资料外，在文献整理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地方志、金石志中的元代文献值得下大力气全面、系统地加以辑录，而且，因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编纂的方志，收录的文献往往互有异同，我们绝不能以查阅其中一种为满足。至于分散各地未见辑录的元代碑刻及拓片，以及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数量也颇为可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翁独健就曾提倡进行《元碑集成》的编纂，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也未全面展开。近年已有学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汉文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多方面进行，以便于学者研究利用为原则，《全元文》《全元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资料的分类整理也很有必要，《道家金石略》的出版曾极大地推动过元代道教史的研究，元代的佛教金石文献存世者更多，如也能汇集在一起编辑成册的话，肯定会推动元代佛教史的研究。

“域外史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资料宝库，这方面的整理与利用，国外学者因得天独厚的条件，已取得丰硕成果，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为此，翁独健曾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先将国外学者整理研究的成果转译过来，以后待条件成熟时再直接翻译原始文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仅完成了第一步，即从西方文字的转译，且种类有限。近年来随着中国元史学者越来越重视“域外史料”和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域外史料”的汉译工作已呈加速度发展，形势喜人。如穆勒（Moule）和伯希和于1938年刊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集校本，至今仍是《马可·波罗行纪》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却一直没有汉译本问世。近年来其汉译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现在一些域外史料的翻译工作已不再依赖西方文字，而是直接与其原始语言“对接”。如著名的波斯文世系谱《五族谱》（Šu‘ab-i Panjgūna）的汉译与整理工作便是直接以抄本作为工作本，逐步开展。此外，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语言学者已开始着手第二步的工作，出版了诸如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论著。

以后，我们仍需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历史学者与语言学者的通力合作。此外，“域外史料”有不少是抄本、写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较少，以往学者研究多通过私人渠道获得，在学界流传不广，给研究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今后有必要建立依托于某一大学或某一研究机构下的资料中心，广泛搜集收藏于世界各国的“域外史料”抄本或刻本，以方便国内学者的使用。

第二是考古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考古发现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新问题。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

结合,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元代考古同其他朝代相比,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其中固然有某些客观原因,如元朝统治的时间较短,诸帝均葬漠北,蒙古人一般无墓室,导致元代墓葬考古不发达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代考古没有工作可做。新中国成立后元代的重要考古发现首推黑水城文书,黑水城文书虽在数量上与唐代敦煌文书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元代世俗社会的情况,学术研究价值丝毫不亚于后者。泉州等地的宗教石刻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征集到的元代文物也有不少,被学者广泛应用于宗教习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元大都、上都与中都等都城史的研究,更是因考古发现较多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才取得了飞速发展。以上情况表明,元代考古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希望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必要响应翁独健关于编纂《元代文物图谱》的倡议,结合考古发现,带动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第三是专题研究的深化与新领域的开拓。尽管 20 世纪的元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明显存在着许多不足,各领域的研究并未得到均衡发展,即使研究较多的领域,成果也不平均。例如政治制度史,对中央机构的研究多集中在省、院、台等重要机构,对部、寺、监等机构的专门研究就显得很薄弱。这方面的问题,在其他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史中区域经济与财政制度的研究,近年来虽取得不少进展,但有待深化之处仍有不少。元代法制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法律编纂、刑罚制度到实体法研究等,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再如宗教史的研究,有关内地佛教史的研究就十分薄弱,即使是学者们关注稍多的禅宗,其实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元代卫生医药,内容丰富多彩,迄今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目前出版的几部元朝断代史(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 年;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已获得学术界较多好评,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专题研究与弥补研究不均衡的缺陷上。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元代专门史著作,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史卫民《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等,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除已有研究外,客观世界的变化和研究手段的进步,都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以往一些被视作研究的“范式”,现在看来,还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近年,日本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的系列通俗读物被大量译成中文,引起了不小波澜。有关“新清史”的热烈讨论,也波及部分元史学者。如何打破以往以汉族、汉语、汉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从亚洲乃至世界视野研究蒙元史,一时成为热门话题。部分学者的讨论与回应,曾结集为《重新讲述蒙元史》(张志强主编,三联书店,2016 年)出版。此外,元代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如何,宋元之交、元明之交中国社会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是有待重新认识的问题。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开

始关注于此,但尚未形成共识,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再如,元代的“四等人制”以往曾是学界的一种共识,但实际上从目前材料,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元朝官方的正式规定。“四等人制”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仅适用于某些具体规定,还是影响遍及元代社会的各个角落?近年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第四是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深化。历史事物是普遍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的复杂程度往往超出人的想象,随着研究视角的变化,即使旧有的研究领域也会释放出全新的学术价值。因此在推动元史继续发展的方式上,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深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拓展”和“深化”分别代表了两种学术路径。首先,“拓展”又可以分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两种思路。时间上的“拓展”主要指将元代纳入中国历史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最为可行的是将元代与之前的南宋金朝时期、之后的明代置于“贯通式”的研究视野之下。实际上,中国史每个断代往往都有自己非常成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彼此又不尽相同。但历史的演进却是逐渐因循的,因此如果将元史领域成熟的视角和意识放入蒙金、宋元、元明之际的历史考察,可能会唤醒很多深藏在这些历史时期深处的重要问题。空间上的“拓展”则是将元史置于13—14世纪世界史的格局之下,重视多种语言史料的解读和比较。这个思路虽在近代中国元史学科诞生之初就已受到很大重视,但在新时代中国日益开放的有利大形势下,才会变成可能。其次,视角的“深化”则更是元史旧有领域内的“升级更新”。如前所述,元史已有专题领域还有待深化的空间,但这种“深化”性质上更可能是“量”的增长或对未覆盖领域的“弥补”,当难以从“质”上提升元史的研究水平。因此若想“更上一层楼”,引入“结构化”的研究视角或许是一种必然选择,即找出不同专题领域间的关系,立体化去考察元代的历史,就如同历史上真实的元代中国确实是由各种历史事物彼此联系而构成的“立体事物”。

第五是继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并直接与国外进行合作。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涵盖元史的蒙古学在18、19世纪一直是国际显学,直到今天,世界各国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关注的问题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有些观点也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20世纪初的中国元史研究,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也正因此缘故,元史被国内不少学者称之为“不中不西”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长期的自我封闭,使我们对外界的学术研究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今后,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拓宽视野,不断吸取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元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在世界前列。而且现在的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大开放大合作的崭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元史研究融入世界正逢其时,可大有作为!

(责任编辑:李成燕)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这三个时间节点是政治上的巨变带来的。首先是 20 世纪初帝制的终结，宣告了“王朝体系”史学的破产；其次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内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由此真正成为国际历史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 年以来的明清史研究，以及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脱离了这三个时间节点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理解。对中国明清史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概括总结，可参见南炳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这个“40 年”的特殊意涵，本文综述的对象以中国内地的明清史研究为主。

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长期被纳入中国古代史的领域，其理由是政治性的，因为明清属于帝制时代，与作为近现代标志的民主共和时代截然不同。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史的后半段被“划归”近代史，中国古代的下限被定在了清代后期。在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一分期的得当与否，只是可以比较而论，从 20 世纪初直至 40 年前，明清史研究的成就远不如中国古代史中的其他断代，而且，讨论明清史，基本也不涉及晚清史的内容。幸而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史学界中社会史、文化史、法制史、思想史等得到恢复和发展，历史叙述得以超越传统的政治史或王朝史分期，使历史学者常常可以讨论元明之际的连续与断裂，也可以将主题从清代前期延伸到晚清甚至民国。

在 20 世纪的前 80 年间，明清史领域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奠基之作，孟森、谢国桢、商鸿逵、郑天挺、傅衣凌、王毓铨、梁方仲等前辈的见解至今还有许多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但毕竟是到了 80 年代之后，明清史研究才能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古代史其他领域比肩而行。因此，回顾 40 年来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特别意义。

一、双重学术背景下的明清史研究

所谓双重学术背景,是指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国明清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和重新走上正轨,以及国际明清史研究界的发展变化给中国同行带来的影响。

李祖德在回忆40年前《中国史研究》创刊时谈及创办该刊的背景“如何拨乱反正,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历史科学如何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是摆在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还谈到《中国史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学术性,“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刊物有所不同,一般不发表政策性、表态性、通俗性的文章,不作时事宣传,不刊登或转载政治性的‘社论’”;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语句作为‘标签’,到处乱贴”;三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要提倡‘百家争鸣’,尤其要保护不同意见发表的权利”(《〈中国史研究〉创刊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2—540页)。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史学界成为共识。如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刘重日、曹贵林的《清官海瑞》一文,就是为了还历史上海瑞的真实面目,一方面重新肯定历史上“清官”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意在批判“文革”前因政治目的故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比如农民战争的研究,一直是新中国建立后历史研究的热点,但在“文革”期间,此前认为农民战争导致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观点也遭到压制。李洵在1978年发表了《明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初探》(《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晚明工商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其的扼制,指出明末农民战争打击了这个统治集团,并为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开辟了道路。同年,顾诚先后发表了与姚雪垠商榷的《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和引起广泛讨论的《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两文,后文否定了清代诸书记载投入李自成麾下的李岩实有其人,为学界高度重视,但其背后其实是李自成核心领导层是否受到士绅集团影响的问题。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同年,第一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召开,198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在此期间,许多学者如赵光贤、李光璧、孙祚民、张显清、王兴亚、南炳文、方福仁、陈梧桐等都发表过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文章,一方面体现了这个传统研究热点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50—60年代培养出来的学者学术关注的结果。

与此相联系的是,除了元末农民战争同样受到关注外,明前期、清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得到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建立者,更

重要的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物很难得到正面的肯定。比如关于朱元璋及明初政治的文章很多，包括关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大量论文。在清史方面，阎崇年出版了《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孙文良与李治亭出版了《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清代诸帝的传记陆续出版，如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远廉与赵世瑜《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孟昭信《康熙皇帝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作品虽然在资料的丰富性上无法与以后相比，但因多属首创，因此颇受读者的欢迎，得到多次重印或再版。

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并不都是采取理论批判或有针对性的观点论战，多数学者回归到正常的、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就是“拨乱反正”的体现。在1987年召开的第二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王毓铨指出：“当前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缺乏活力，使读者感到千篇一律，枯燥乏味，不是因为研究课题不对，也不完全在于没有采用新方法，根本问题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时候甚至不顾事实，强为之说……今天要想写出真历史来，首先必须端正态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林金树整理《向明史研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讨论会》，《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这个说法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强调“求真”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性，而不是曲学阿世，这就把正常的学术研究与“拨乱反正”统一了起来。

在这样的共识之下，1978年，傅衣凌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明清社会发展特点的重要文章，商鸿逵发表了他关于山海关战役的新考证，李华首次利用会馆碑刻等资料研究了北京的行会，叶显恩也陆续发表他关于徽州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傅衣凌《论明清社会与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合刊；《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叶显恩《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在这些研究中，既有比较宏观的梳理，也有区域性个案；既有传统的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也有如今非常常见的利用碑刻、谱牒所做的社会经济考察，展示了和此前相比颇为不同的面貌，也昭示了此后明清史研究繁荣发展的前景，使发现和精研材料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成为40年间的显著特征。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和举行是学术研究正常开展的标志之一。1980年，南开大学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瑞士在内的120多位学者与会，可以说是“文革”后中国明清史学界的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包括了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这种打破分期界限的学术交流长期以来并不多见。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在无锡组织了明史专题研讨会，1985年便在黄

山举行了首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两年一届,延续至今。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北戴河联合主办了全国清史讨论会,1983年和1985年又接连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讨论会,先后集中于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等主题。虽然当时的有些讨论,如关于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清兵入关是历史必然还是偶然机遇等问题,还带有时代的印记,但学者们的学术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所提交的论文也大多是高水平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明清史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井喷式的景象。据有关统计,1981年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清史论文为200多篇,到1984年就达到500多篇(参见林永匡、王熹《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以往除了1956年出版的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以外,几乎没有稍具规模的明清断代史著作,但在1980年,《清史简编》(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辽宁人民出版社)上编出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第一册出版。在稍晚的1985年,汤纲和南炳文《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郑天挺主编《清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明清史研究的水平,而且为大学里相关课程提供了规模适当的参考书。到1991年,由王戎笙主编10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显示出与其他断代史相比的后来居上之势。

学术交流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使得此前少有的中国明清史学界与海外之间的交流逐渐成为常态。1979年,有学者撰文介绍美国的《清史问题》杂志(张注洪《简介美国的〈清史问题〉杂志》,《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该杂志后更名为《晚期帝国研究》,是反映美国清史研究状况的一个窗口;同年,以魏斐德为团长、罗友枝为副团长的美国明清史代表团访华,开始了战后中美明清史学者的首次接触。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分头在各高校与相关学者座谈,讨论的话题涉及明代制度史、明清易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太平天国研究的新进展,以及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法制史和思想史等(Frederic Wakeman, Jr.,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明清史学界与中国同行的交流逐渐正常,日本学者经常访问中国,如1982年,北海道大学的滨岛敦俊访问厦门大学,向中国同行介绍了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状况;1983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复旦大学与伍丹戈、樊树志合作,研究明代江南的土地关系问题;他们还将傅衣凌、王毓铨等中国学者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学界,在80年代以来中国召开的明史或清史的学术会议上,也都能看到日本学者的身影。

此后,一些国外学者的明清史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寺田隆信曾于1982年到山西考察,与山西大学及山西财经学院的学者座谈,

其《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对中国学者的晋商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山根信夫1980年在上海访问期间,介绍了战后日本明清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主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合拍;此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导致了日本学者的“地域社会论”,这一研究特点在1989年的第三届国际明史研讨会上由倡导者森正夫介绍给中国同行,1993年该文译成中文发表,而1994年在西安举行的第五届社会史年会,也以“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为主题,一些明清史学者亦在会上被称为“田野派”。正像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这样的研究走向除了各自国家的学术传统以外,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各国学界都产生了影响(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这一方面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明清史学者与世界各国的同行一样,都受惠于国际史学的一些新途径、新方法;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共性,各国学者之间建立了更密切、更频繁的学术联系,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长期稳定的合作。

在同样的学术思潮和战后“区域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的明清史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向。在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风靡一时之后,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另一本书,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柯文在书中提到并推崇的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罗友枝《清代中国的教育与民众识字率》、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端教派》、韩书瑞《中国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魏斐德《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等著作,代表了与上一代学者(费正清等)不同的“中国中心”取向,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不仅引发了他们在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而且也在自己的研究中与之讨论。

由于理念、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启发性,大量海外明清史著作得到译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与明清史有关的著作不下20种。另一套大规模的译著是国家清史工程推出的《清史编译丛刊》,包括史料性质的著作和今人学术论著已出版近70种,加上其他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明清史译著(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其数量和影响力是其他断代史无法比拟的。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外明清史学者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即开始超越那种在学术会议上各自宣读论文然后互不相干的层次,出现真正平等的共同研究,且研究成果为海外学者广泛征引。如在明清经济史领域里的李伯重(其代表作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他关于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水平的看法,为彭慕兰、王国斌等人接受,故被视为美国“加州学派”的一员。在另一本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的论文集中,他也是唯一的中国作者(Li Bozhong, “Was There a ‘Fourteenth 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 in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6卷本《中亚文明史》(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V, UNESCO Publishing, 2003)的作者队伍中,包括了一些中国学者,如第5卷中的马大正、刘正寅等。

正因为有这样双重的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近40年来已无法彻底把国内学者的讨论与海外学者的讨论分离开来,相互之间有借鉴、启发,也有商榷、争论,这说明明清史研究已经国际化,无论哪方无视这一点,都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二、变迁与连续性

历史学者绝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为锱铢之学,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脉动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明清史学者来说,就是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以前热烈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稍后讨论的“现代化”问题,都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日本学者讨论的“近世”与“近代”问题、美国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概括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period)变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同样是这种关注的反映。

在这40年中,中外学者们对16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形成共识,这一共识显然是接续了此前对明朝嘉万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大多并未急于给这种变化定性。20世纪80—90年代,对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热点,包括区域性商帮、会馆、市镇经济的研究成果迭出。80年代初,叶显恩接连发表有关徽商的论文(《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陈学文出版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后又有《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书出版。同时,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工商业领域的研究、张正明的晋商研究、张海鹏和王振忠的徽商研究、许檀的山东商品经济研究等接连问世(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范金民、罗仑《洞庭商帮》,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正明《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许檀《明清时期山

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与此相关的，是大量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出现，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相当详细的梳理和概括，此处不再赘述（可参见颜晓红、方志远《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 年第 4 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没有陷入沉寂，而是继续细化、深化，并向北方和边疆地区拓展（可参见林枫、孙杰《关于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林雨薇《明清市镇研究综述（2001—2013）》，《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5 期）。

对这样一种社会变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赵轶峰给明清社会定义为“帝制农商社会”，呈现出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 年）。李伯重前引书将 16 世纪 50 年代以降江南地区的经济变化，称之为“早期工业化”，他认为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同样属于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斯密型成长”，而且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这种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尽管并不一定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他的估计与黄宗智的看法不同，后者认为是人口压力造成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导致了明清工商业经济的活跃，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 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 年）。对此，明清经济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过密化”为题的讨论文章约有 40 篇之多。尽管学者们对黄宗智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实证数据各有褒贬，但多认可他与彭慕兰一样，力图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摆脱出来，努力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去理解中国式发展道路（可参见叶茂《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4 期。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 年第 2 期）。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一个清晰确定的结论，但显然比过去的研究进了一步，对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对明清社会变化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以经济变化为全部出发点，也有学者概括了晚明社会的 11 个特征，并据此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5—27 页）。

但我认为 16 世纪前后这场变化在这 40 年讨论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讨论已经绝不仅仅限于以生产力为核心的问题。当然，经济领域的问题仍然重要，但人们比此前更关注市场的问题和制度变化的问题。如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自全汉昇等开始关注以来，近年来又随着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一书的译介而引发学者们的热议，进而转入对财政体制转变的深入思考（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 年第 5、6 期；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

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当然这个问题必然与海外贸易有关，不过传统的海外贸易史研究或走向东南沿海地方社会自身发展脉络的挖掘，或走向一个海洋史的宏观框架，这就把中国的这场变化置于16世纪开始的全球性变革过程中去思考，同时又赋予这场宏观的运动微观的地方性视角（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同样的关注也跳出了江南和东南沿海的范围，向长城沿线扩展，甚至将国家的边略视为对这一全球性社会变动的因应（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样一场社会变化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必然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实践中，而近年来这类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日益增多（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三联书店，2015年）。

正是由于人们对晚明发生的社会变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必然引发对另外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是在这些变化发生前的明初社会是怎样的？二是明清更迭之后，这些变化是中止了还是一直延续？

前一个问题并不是明史学界率先提出来的。学界曾大多认为，明初是个政治专制、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的时代，这种认识既与吴晗的《朱元璋传》以来的政治批判有关，也与前述对明中后期出现新变化的讨论有关；前者因现实政治的原因对于明初的诸多事件和制度大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后者因对后期新变化的肯定而必然导致对前期历史的消极评价。然而，当唐宋史学界大多认可唐中叶以降至北宋中国社会发生了社会转型时，一些学者追问：在这两次社会转型之间的南宋至明中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两次转型是什么关系？其结果就是前引史乐民、万志英主编的那本《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这300多年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唐宋变革延伸到明清变革的，换句话说，是强调历史连续性的。而持异议者如萧启庆则认为金元时期中国北方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在两次转型之间存在断裂（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198—222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会导致对明初中国的不同认识。

近年来，李治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明初对元代的承继性。综合他的看法，一

是肇始于元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南北关系格局为明清所延续,二是元开创的行省制这种中央—地方权力结构模式为明清所继承,三是配户当差包括军户、匠户等制度,四是贵族分封,五是南北分治,六是对边疆的直接管理,还有像纸币的推行等,都体现了元与明初在政策、制度层面的连续性。总的来说,他认为明初的政策与宋元对江南的政策背道而驰,而把元代对北方的政策向全国推广,直至明中后期的变革才复归原来的“江南”轨道(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但李新峰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回顾了李治安的上述观点以及赵世瑜、葛兆光分别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讨论金元或宋元与明朝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从地缘格局、制度来源、变化趋势三个方面论证了元明国家的不同,又正面申论明初统治者践行的新改革,最终认为元明之间的变革要大于宋元和明清之间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北族的“入侵”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破坏,而且使此后的发展出现长期停滞(可参见赵世瑜《从明清史看宋元史——倡导一种“连续递进”的思考方法》,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三联书店,2008年,第219—250页《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这样的看法体现在后一个问题,即清军入关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如何的问题上,直到最初几届全国清史讨论会上,清政权入主中原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仍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清初战乱平息之后,统治者基本承袭了明朝的统治方式和管理体制,比如在国家机器方面,明朝中央的内阁和六部制度,地方从省、府、州县到基层管理体系依然延续,关外带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八旗旗主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参见孙文良《论清初统治的因革与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杨珍《历程 制度 人——清朝皇权略探》,学苑出版社,2013年)。在赋役征收方面,雍正朝普遍推行的摊丁入地(樊树志《“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刘志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以及此后在各地出现的顺庄编里或粮户归宗(刘永华、郑榕《清初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改革——来自闽南的例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徐枫《清前期赋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都是明代中后期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财税制度改革的

继续。在边疆族群方面,晚明开始的“改土归流”也在雍正以后陆续展开(参见李世愉《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在社会经济方面,在康熙后期渐次恢复的农业和工商业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发展,收复台湾后,海禁复弛,重回隆庆开海的局面,事实上,即使在清初海禁时期,海上“走私”贸易也并未停止过。魏斐德关于“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延伸入民国时期”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魏斐德《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刘志伟、陈春声在提到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为何以“一条鞭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认为,梁方仲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田赋制度依然延续着“一条鞭法”的基本架构,才决定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切入点(见刘志伟、陈春声《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这样的认识在美国“新清史”(“新清史”得名于下书: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James Millward, Ruth Dunnell, Mark Elliot, Philippe Forêt, ed., Routledge, 2004)兴起之后受到了质疑。虽然学术界的争论聚焦在清军入关之后是否“汉化”的问题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汉化”的立场似乎表明某种连续性,而强调清朝的满洲“族群性”则表明与明朝统治方式的断裂。当然,在断裂的意义上,“新清史”关于清朝统治独特性的看法与前述主张满洲入关对中国社会造成破坏的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它强调的是清朝的内亚性,即清朝的“内亚帝国”性质,使清时期的中国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内亚地区完成了有效管辖。也就是说,清所体现出的与明的断裂,不仅没有带来倒退,反而带来了发展,至少是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这样,对明清的连续与断裂的讨论就发生了变化。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曾在承德召开中英通使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大多对与会的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击》(三联书店,1993年)一书对清朝的评价持不同意见,而这正是米华健在其主编的《新清帝国史》(London: Routledge, 2004)一书“导论”中阐明的观点。

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在近10余年中异常热烈,其中既有大量非学术的因素,也存在一些误解。“新清史”对“汉化论”的否定在于以往清史研究过于强调“清承明制”,较少看到清史上满洲特性或“内亚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反对者或重申汉人传统或明朝制度对清的重大影响,或指出以往的清史研究也并未忽视对我国蒙古、新疆、青藏地区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强调的清朝与明朝的差异性,更多是指他们在天下观、夷夏观,以及治理方式上的不同,它并未拒绝承认清代与明代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上的连续性。对于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界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探讨对于我们认识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的认识必定有所启示。

三、国家·社会·人

近 40 年的明清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学术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法制史、人物研究等领域继续蓬勃发展以外,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环境史、科技史、艺术史、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等不同研究视角也异军突起,使明清史研究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是其他断代史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是受惠于明清时期的材料大大多于前代,由于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和观念更新,新材料被不断发掘、整理和利用,使这些方面的研究得以开展;二是因为明清时期整个世界历史也在剧烈变动,中外联系比之前更为密切,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研究者对明清历史上的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重新审视。

本文不拟对以国家、社会、人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诸多研究成果进行概述,而试图区分以国家、社会、人或人群为研究出发点的不同研究,因为有不少研究虽然以社会、人为具体的对象,但仍然是以比较抽象的国家为出发点,而也有一些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国家制度,但却以活生生的、能动的人及其实践行为为出发点,这两类研究实际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立场和历史认识取向。

明清国家的各项制度一直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明史研究而言,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渐趋成型的内阁体制成为讨论的热点,从关文发和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到从不同侧面展开讨论的论文,都意在说明明代中央集权的加强或皇权的强化;而就清史而论,无论是关于满洲旧制如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研究,还是有关新创的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研究,大体上亦不出这一共识(例如,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这一时期,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也有不少成果,如柏桦、何朝晖、吴吉远、魏光奇、胡恒等都有专书出版,另外也有文章讨论督抚制度、巡检司制度等(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表明研究重点从国家的制度设计向权力的运作转移。有些学

者利用政治学的概念,从权力的机制、关系、运行等方面重新加以梳理(如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另一些学者则转而关注制度创设背后的人或人群的活动,比如谢湜对太仓州设置的研究,认为其创设出于州、卫、县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官员之间的争斗;另如冯贤亮把江南州县的行政行为置于社会不同方面,如税收、灾荒、盗匪等问题中去考察;再如胡铁球对明清歇家的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非正式组织”。这就是邓小南所倡导的“活的制度史”(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这样的转变同样发生在其他制度史研究中,比如在赋役制度、卫所军户制度、盐法制度和法制史的研究领域,变化就颇为明显。以赋役制度及相关的户籍、基层组织的研究来说,自傅衣凌、梁方仲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以来,利用各种册籍、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已经开始揭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和地方起源,较早有栾成显基于徽州文书、陈支平利用福建契约文书、刘志伟利用广东地方志进行的出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近年来杨国安对两湖地区、叶锦花对福建泉州的盐场地区、黄忠鑫对徽州地区、万明和侯鹏对浙江地区、薛理禹对江西地区、麦思杰对广西右江地区的研究,利用了更为丰富的地方民间文献,使我们对地方民众的实践如何与国家制度形成互动并最终影响了国家制度的转变,有了更为多元的认识(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叶锦花《户籍制度与赋役需求及其规避——明初泉州盐场地区多重户籍现象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黄忠鑫《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侯鹏《明清时期浙江里甲体系的改造与重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薛理禹《明代中后期的人丁与丁银——以江西为例的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麦思杰《赋役关系与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区域社会的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以卫所军户制度的研究来说,自顾诚关于卫所制度的系列研究、特别是他关于明帝国两套行政管理系统的研究发表以来,陆续有不少精彩成果问世,既有关于屯田数字的讨论,也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述及不同卫所的设置和分布的研究。张金奎、彭勇、梁志胜等学者参酌前人研究,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填补空白领域方面都颇有建树。其中张金奎在其《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一书的系统梳理基础上,开始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讨论明代原籍军户的社会地位问题,开始跳脱出原来

的制度史框架,进入实践层面的讨论,可与美国学者宋怡明讨论福建军户应对国家差役的策略相互印证。同样,邓庆平在讨论蔚州卫在清代改县后造成的资源争夺和重新配置时,把关注点从以往制度变革的泛泛而论转变为制度变化和地方民众的反弹之间的相互因应。由于卫所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因此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卫所军户如何在地化的过程,体现了新一代研究者揭示国家制度与具体人群的能动行为之间关系的努力(有关研究可参见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该文未提及的有张金奎《明代原籍军户社会地位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邓庆平《卫所与州县——明清时期蔚州基层行政体系的变迁》,《史语所集刊》第80本第2分,2009年。林昌丈《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辑。徐斌《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另外宋怡明的研究可参见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同样的特点体现在盐法制度和法制史的研究中。前者有刘森、陈锋、萧国亮等学者在盐运、盐税、专卖、盐官、灶户等制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近年来黄国信则把食盐专卖制度、特别是清代的专商引岸制度,放到一个区域社会里不同人群的相互博弈中去思考,使得某种划一的制度或制度变革在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这一研究取向吸引了不少学者将盐法、盐政与盐场社会和更大范围的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正如刘志伟所论,“盐场的历史,因为是王朝国家在本地社会建立的最早的控制形式,成为本地居民构建正统身份认同的历史记忆”(有关研究可参见何亚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综述》,《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此处不一一注明。另见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刘志伟《序》,黄国信、钟长永主编《珠江三角洲盐业史料汇编——盐业、城市与地方社会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盐业或盐法制度就不仅是一种物资生产与经营和国家体制,而且是具体的人活动的结果。

后者则因新的研究视角和清代州县档案的利用变得焕然一新。在黄宗智、滋贺三、寺田浩明等人的观点刺激下,中国学者也不再局限于资料上的朝廷法典和对象上的法理和程序。张小也认为,应在三个方面思考法制史研究的新进路:1. 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观察法的沿革;2. 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观察法的位置;3. 在微观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观察法的实践(《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2007年,第27页)。尽管在此时期,仍有许多研究围绕律条、程序进行,但明显有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趋向,注意律条与司法实践之间差异及断案复杂性的研究更多。特别是历史学者而并非法学学者越来越多地介入法制史研究,使得法律问题得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和重释(依然关注法学问题的法制史研究如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

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南京出版社，2016年。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廖斌、蒋铁初《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将法制史研究与地方社会实践相联系，或被称为“法社会史”的成果日益增多，如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陈会林《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以中国明清两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卞利《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但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和深入理解地方历史基础上的研究仍然值得期待。显然，清代法制史研究的成果数量要大大超过明代同类研究，这是因为这时有满、汉、蒙、藏等不同法律体系这一多元性特点，二是因为清代州县档案及族谱、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大大多于明代，三是上述研究的新取向比较容易在清史研究中实现，四是诸多学者关注中国司法实践的现代转型，而这直接上承的时代是清代。

人及其活动从来都是历史研究关注的中心，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也从不乏人物传记、思想和作品（学术、思想史）的成果，当然，帝王将相和知识精英仍然是这些研究中的主角。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些人总是留下远超他人的材料，他们的作为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谈到“隆庆和议”，我们无法躲开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甚至三娘子。但通过人物，我们可以对时代有新的认识，而不是先有一个既定的时代，再去研究一个人物，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研究的一个基本标准。假设已经认定某场战争是“非正义”的，那么进行战争的人就必定被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如此，除了为先定的结论寻找证据和一些细节考订之外，其实就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了。韦庆远对明代“三杨”、张居正、清代的皇商范氏的研究，就都是可以通过人物来认识时代的（《三杨与儒家政治》，《史学集刊》1988年第1期；《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田澍多年来一直对明世宗和嘉靖朝进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观点独到的论著；何龄修、杨海英长期关注明清易代时期史事，后者所研究的人物逐渐从声名显赫者转移到几乎不见经传、只是通过“壬辰倭乱”时期援朝将士的家书才得以为人所知者（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何龄修《史可法督师扬州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1998年新3、4期。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论丛》2006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另有学者涉猎人物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正如史景迁写过《中国康熙皇帝的自画像》和《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也写过《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样，我们也需要关注普通人，需要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或金兹堡《乳酪与蛆虫——16 世纪一个磨坊主的宇宙观》这样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展示一个普通人眼中的明清易代或社会变迁。显然并不是没有材料，像姚廷遴《历年纪》那样的文献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只是在这 40 年中这样的成果寥寥。

在另一方面，人及其行为不仅是我们描述的对象，更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的出发点（这一认识在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中得到充分阐发。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用一个略嫌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济改革起步时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如果以国家为出发点，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项国家的政策或制度，但以人及其行为为出发点，我们就知道它本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创造，后被安徽省委将其经验上报中央，才被作为统一国策推广到全国。晚明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赋役制度改革所经历的过程，几乎与此同出一辙。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开始在这个理念支配下进行一些尝试。

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活跃的农民起义史，在近 20 年来的明清史领域里沉寂了，甚至没有综述愿意包括这些内容。刘志伟、罗一星等学者却非常强调黄萧养起义对于珠江三角洲社会重组的分期意义，这不仅包括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里甲制变化和宗族建构，也包括当地族群的划分（刘志伟《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 3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陈春声通过潮州地方的“民”“盗”不分现象，说明嘉靖及以后时期的“倭乱”和“海盗”问题，不过是沿海地区这类现象的延续和扩展，是私人海上贸易等因素的后果，也是明清易代时期南明在岭南苟延的基础（《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黄志繁从宋代的“虔寇”、明代的徭、畬，到清代的棚、客，讨论了赣南地区长期的动荡背后的生态困境和山区开发，认为“盗寇”这种国家话语背后实际上是对人口流动和区域开发的控制过程（《“贼”“民”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 年）。而唐晓涛则把明中叶韩雍、王阳明等都参与处置的“大藤峽徭乱”乃至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都置于一个区域的族群发展的脉络中去重新理解（《徭徭何在：明清时期广西浔州府的族群变迁》，民族出版社，2011 年）。这类研究当然不只是重提农民起义史，它们和以往的农民起义史的区别在于，后者无论怎么强调阶级矛盾的紧张，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的——农民是反抗国家的暴政，而国家又怎么去镇压他们——恰恰没有去研究那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农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被国家污名为“盗贼”，而这之后他们二者又是怎么博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体制的。

所以，这个出发点其实不是某项研究的出发点，而应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比如在历年的清史研究综述中,我们看到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是个热点,乾嘉学术也被持续关注,都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一个是动荡时期,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时期;一个主要体现为政治和战争,一个则主要是思想与学术,二者似乎很不相同。如何走向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的研究?就前者而言,以上所举或许可以作为借鉴;就后者而论,艾尔曼对常州学派的研究、程美宝对近代广东文化的研究,以及麦哲维对学海堂的研究,在取向上也是可以参考的(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Steven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四、从区域史到全球史

历史总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而选择何种空间尺度来进行特定研究,应该是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尽管在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史等领域,长期以来均会选择特定的空间尺度来开展研究,但以比较抽象的王朝版图或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自己研究范围的情形仍非常普遍。这可能有资料限制的原因,也可能是大一统观念在起作用。不过,在40年的明清史研究中,特别是近20年,由于地方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区域研究已成为一时风气,而明清史与整体性世界的直接关系,也导致了跨区域的、甚至涉及全球联系的新思考。

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经济史和边疆民族史是始终不乏区域研究成果的。在前面提及的有关商人、市镇、市场的研究中,多数都是区域性的,不过以往江南研究一花独放,有大量成果涌现,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的研究正在迎头赶上,比如卞利对江西土地租佃关系的研究、张建民对秦岭和大巴山区区域开发的研究、任放对长江中游市镇的研究、鲁西奇对汉水流域农业的研究、尹玲玲对鄱阳和洞庭湖区渔业的研究、蓝勇对滇铜京运和皇木采办的研究、张应强和林芊等人对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和木材贸易的研究、马琦对滇铜黔铅的研究等等,亦呈不胜枚举之势;城市经济史则有高寿仙对明代北京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北京史领域里的重要成果(卞利《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中游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西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尹玲玲《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代洞庭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000 年第 1 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 年第 6 期。《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 年。林芊《从明代民间文书探索苗侗地区的土地制度——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三》，《贵州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清初清水江流域的“皇木采办”与木材贸易——清水江文书·林契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 年第 2 期。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年。高寿仙《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 年）。

边疆、民族史本身就具有区域研究的特点，而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清史研究中是为重点。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明代的东北女真史属于明史中的边疆、民族史，但对于清史来说，就是满洲入关前史了。同一个东西，在前者是地方史，在后者是“龙兴”史，是新王朝的前史。这背后是中原王朝中心主义的立场，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边疆、民族史就不可能是区域研究。在这 40 年中，涉及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成果逾千，但在其中，有相当部分研究只是将其作为王朝实施的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新策略，而较少考虑它是地区开发、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等新形势的反应，更少考虑 16 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变化和北部藏区的“内亚”因素。这样，在本质上，这还是一种“中心”支配“边缘”的研究，而非具有地方人群主体性的区域研究。

当然，建立在史实考索、新史料和新视角基础上的许多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明代，蒙古问题始终为朝野关注，因而成为明代边疆、民族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关的，是对长城和九边的研究。关于漠南蒙古，达力扎布有系统的梳理；曹永年也陆续发表关于明代蒙古史的论文；1985 年，由中国蒙古史学会创办的《蒙古史研究》杂志开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许多明清时期蒙古史的论文陆续在该刊刊载；明代长城修筑及边镇的研究近年来则有彭勇、赵现海等人的研究，且开始向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的研究拓展（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年。曹永年《明代蒙古史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关于明代女真社会，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书中利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保留的早期信息，结合其他史料，描绘出明代女真社会组织的基本面貌。杨旸等也曾对清代黑龙江下游的噶珊制度进行过探索（杨旸、徐清《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在这 40 年中，不仅建立起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样的国家级机构，高校中也设立了许多专门研

究机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本族本地区历史研究的权威(如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年;王力《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民族史研究,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人们普遍认为,区域研究是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路径。事实上,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是专题性的,这与学者们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不同理解有关系。由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文献遗存丰富,所以社会史研究成果在明清史领域中也最多。以宗族研究为例,冯尔康、陈支平、常建华、郑振满、刘志伟、唐力行、赵华富、吴仁安,直至许多年轻学者,都有许多重要论著,其中有些是综论性的,有些则是区域性的(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成果之多,几至目不暇接。显然,有些研究重在讨论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化,兼及其区域性特征,另有些研究则意在通过观察地方宗族和体会宗族产生理解一个特定地方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史研究中,类似的情况还有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比如有的侧重教派,有的侧重宝卷,有的侧重政治事件,有的侧重地方社会。也有大量的出版物,特别是有大量的文献出版,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刘永华主编《仪式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些研究也非常

清楚地显示出了关注点的差异：主要是宗教行为本身，还是特定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礼仪标识”。

由于区域研究被一些社会史研究者视为地方史走向整体史的方法路径，所以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被标签为“华南研究”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从对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莆仙平原、韩江流域的研究开始，渐次扩大到江西、两湖、华北和西南地区。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研究之外，对广东的研究还有黄海妍、肖文评等人的著作。在华北方面，杜正贞将山西泽州的村社传统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加以分析，力图发现晋东南地区乡村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乔新华探讨了山西洪洞在明清时期的变化如何营造了类似大槐树传说之类文化现象；张俊峰同样研究洪洞，但其切入点是水利社会；胡英泽则关注黄河滩地的社会（黄海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 年。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三联书店，2011 年。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2010 年。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在已有的福建区域研究基础上，刘永华对闽西四堡地区礼生的研究重现了“文字下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Yonghua Liu, *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 Brill, 2013）。对西南地区的探讨，有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三联书店，2011 年）、梁勇对四川巴县移民社会的研究等（《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 年），都揭示了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前面亦已提及，吴滔、谢湜以江南地区为对象，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运用到区域历史地理的小尺度研究中，开拓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彭慕兰曾提醒说，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Kenneth Pomeranz,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1）。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华人华侨研究也是具有较多成果的领域，特别是海上交通史后来拓展为海洋史，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上述研究领域自然而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进入 21 世纪以前，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还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可能是由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领域的进展要依赖于国外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到这个时期开始有了条件，但仍处在研究过程中，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就逐渐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成果。汤开建对澳门史的研究工作开始得较早，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澳门

史的专著和资料集,随后又有黄庆华《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可以说是这一领域内围绕同一主题的质量最高的一批著作。关于东北亚地区,有白新良主编、多人合作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何慈毅对明清时期日本与琉球关系的研究著作。还有不少关于明代“倭寇”问题的论文。关于中亚地区,有张文德对明朝与帖木儿王朝关系的研究著作;关于欧洲,有米镇波对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马廉颇对清代中叶中英关系的研究(《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有大量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论文。在一些论文集中,关于传教士的研究在新材料和新观点上得到了较多体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海上关系的研究成果要多于对陆上关系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因为前者正处在勃兴、而后者正处在衰落的态势,而在实际上明清国家对其关注的程度倒并不一定如此,特别是在明代。

应该说,传统的中外关系史为一种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也即全球史奠定了基础,但在观念上,大多成果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双边关系,还不是一种在区域性世界或整体性世界的视野下对中国与外国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这方面,关于宗藩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某种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世界的论说(如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但多少还是有从中心看边缘的痕迹。在近年来兴起的“海洋史研究”中,这种全球史的认识框架开始体现出来,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2010年开始出版,迄今已出版10辑)各辑的文章中。这份期刊刊载的文章大多是讨论明清时期的,作者无论中外,都很少采用某种两国双边关系的角度,而往往选择一个具体的区域,城市或乡村、港口或内地、海岛或海峡,由此观察它们与外部世界形成的网络,这样,每一个小的地方都是一个大的区域或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文章采用了来自域内和域外的商业、外交档案,地方民间文献,考古发掘和实物资料,涉及中外不同人群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高水平个案研究,由此区域史转化为全球史。

总之,4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明清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人员增长数十倍,研究成果数以万计,本文所及,挂一漏万,如明清思想史领域几乎就没有涉及,另外国家清史工程如此重大的项目,也未及点墨。并非因为这些领域和成果不重要,实在是所拟四个专题的局限和篇幅的限制所致。这些进步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和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的基础上的。诚然,在资料的挖掘、理念和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责任编辑:李成燕)

来 稿 须 知

1. 凡投往本刊的稿件及其所涉书籍都需遵守国家法令、法规及民族、宗教、外交政策。

2. 本刊以介绍海内外中国古代史(1840年前)研究状况及前沿问题为宗旨,发表的文章专业性强,大多为中国古代史某一断代或专题的研究综述评论(不必面面俱到,请突出评论性内容),兼及会议和书评、书讯(两年之内的新书)。年度述评、笔谈、新视野和新资料、专题访谈、名家序跋等系本刊约稿栏目。与上述范围不符的文章请投往他刊,以免影响大作的及时发表。

3. 写作要求:主题明确,平实精当,要言不烦;叙述观点要忠实原作者本意。引用内容必须是公开发表的文字,凡未公开出版的内部刊物,博、硕士论文中的内容以及网络首发的文章请勿引用(会议综述除外)。

4. 寄稿要求:请寄纸本和电子文本各一份,缺一不可。纸质来稿请在另页注明稿件的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以便双向匿名评审。本刊从2016年1月1日起启用采编平台(<http://www.zgsyjjzs.org/>),请作者注册,登录,投稿。本刊投稿计时以纸本和电子本均到达后起算,若三个月未收到采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也可在采编平台上查阅稿件的处理进度和结果。

5. 字数要求:重要的述评文章以不超过9000字为宜,笔谈最好在4000字左右,会议综述、书评限于2000字以内,书讯在1000字以下。以上数字都以Word计算为准。

6. 来稿格式:请参考采编平台上的《文稿技术规范》,一般而言,文章采用文内注格式,本刊不用脚注。纸本及电子本均采用Word文本,A4纸排版,正文五号字,默认边距,单倍行距。

7. 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删改,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来稿时予以注明。

8. 请书评、书讯作者在投稿时同时寄上所评的著作,所评书必须是海内外已经公开出版的正式出版物。会议报道需要同时寄来会议手册及论文集,以便核实。

9. 因为财务结算的原因,本刊稿酬半年发放一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负责寄送作者样刊两本及本刊发行工作,垂询请致电:010-59366555。

10. 本刊严禁一稿多投,一经发现,该作者文章永不采用。已在网络及内部媒体首发的投稿也照此处理。

11. 请作者严格依照以上要求投稿,以减少不必要的退改。

12. 本刊对所登稿件拥有长期专有使用权。作者如需将在本刊发表的文章收入其他公开出版物中,须事先征得本刊同意,并详细注明该文在本刊的原载卷次。

13. 本刊遵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规定,不收取任何费用。